

胜利街贯通五国旧租界

湖南街，玛琳街，德托美领事街，威廉大街，中街，大和街——六条街本是首尾连通，名称却要华洋参半，横穿五国旧租界，沉睡历史沧桑中。新年前的12月7日，《长江日报》报道《百年老街成天然摄影棚》，热门影视剧《恶意》《失笑》《半熟男女》《你是我的春天》《戴假发的人》纷来取景，把百年老街推到镜头前。

六条街地处租界中轴线，东西长达3.8公里，半个小汉口。英、俄、法、德、日各霸一方，洋行、洋饭店、洋教堂、洋波罗馆乃至洋人墓蜂拥而至，还挤进来葡萄牙、丹麦、挪威、芬兰四国领事馆，人称“八里风飘九国旗”。有血气的武汉人看不惯，也只得像京城人瞧东交民巷，以“望洋兴叹、与鬼为邻”抒发无奈。

租界俨然“国中之国”，设立巡捕房侵犯中国警察权，除法租界在西贡街，其他全布局在中轴线上，虎视眈眈。一首《汉口竹枝词》，道出人们的提心吊胆：“鸿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边界。莫向雷池轻越步，须防巡捕捉官差。”中国人力车夫拉客，路幅宽窄不一，交通标识各异，即便印度、安南籍巡捕也狐假虎威，稍不留神便招杀身之祸。光天化日之下，屡屡发生惨案，典型的就有1911年1月21日英租界吴一狗、1913年6月17日法租界龚银保、1925年2月17日英租界徐典等人力车夫，仅因误擦巡捕或内急小便，便横遭殴打当场致死。特别是1927年4月3日日租界，日本水兵乘车不给钱，重伤一名人力车夫，捅死一名劝阻路人，引起国人公愤。日租界调集大批水兵上岸，领事馆卫队机枪直接扫射，手无寸铁的民众死亡9人、重伤10人，酿成震惊中外的“四三惨案”。

1938年日军逼近华中，武汉人同仇敌忾，将日租界的中街、大和街、平和街，分别更名为一二八街、八一三街、九一八街，遗憾因沦陷而未及施行。

1946年元旦，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趁着五国租界中的法租界、日租界最后收回，始于1861年的六条街，合并为一条街，武汉人抑制不住的胜利喜悦，终于定格在街名上。

2026年元旦来临，胜利街命名80春秋，从江汉路到卢沟桥路，重走当年中轴线，不再有踩痛无望的呻吟，而是踏响不屈的回声。

1911年俄租界宝善里，革命党人试制炸弹，提前引爆武昌首义。1927年俄租界王宠佑住宅，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来，掀起大革命狂飙。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中共中央领导人隐蔽到英租界德林公寓，筹备召开八七会议，决定举行秋收暴动，出征发动南昌起义。1938年日租界大石洋行，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立，高擎全民抗战大旗；卢沟桥路口一栋日式洋房，新四军军部宣告诞生，召唤江南健儿挺进敌后。

1949年，武汉解放，帝国主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英商安利英洋行大楼改造成“胜利饭店”，华俄道胜银行大楼入驻“胜利文工团”，赋予江城新的象征。

2019年，武汉解放70周年，武汉警察博物馆在德租界巡捕房旧址开馆，深有一层意味，提醒人们不忘血腥过往。

历史遗存经受淬炼，最终转化为城市红利。去年11月1日，延庆里焕新归来，造热第八届武汉设计双年展。今年1月7日，《武汉晚报》“两会热议”报道《延庆里的爬墙虎又重新种上了》，无疑是天然摄影棚的新晋取景地。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涛 王军振 王四清 刘海燕

朱永利 李军 张智勇 李文洲

张冰峰 陈红英 林伟 胡蓉

唐云峰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濛

编辑：刘玮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鹏

阅城偶记

<<<< <

1 胜利街贯通五国旧租界 / 简桦

时代年轮

<<<< <

4 1926，湖北农民运动潮涌大江 / 曹波 肖诗静

风雨同舟

<<<< <

11 履职路上的“三部曲” / 李运玲

九城同心

<<<< <

15 青山犹记：通山地方病防治亲历记 / 李胜洪

委员天地

<<<< <

21 从讲台到兰台：我的深耕与追寻 / 吴先华

24 让“黄陂造”走向世界 / 秦尧

目录

CONTENTS

商聚汉皋



27 为历史筑馆，让光影成像

/ 赵汝波（口述） 甘 灿（整理）

人物述林



31 从珞珈学子到党报总编：朱九思的两篇早期佚文

/ 李卫国

35 大江流日夜 笔墨写春秋

/ 施江城（口述） 银 华（整理）

40 韩桐庵与首任台湾兵备道擦肩而过

——武汉市档案馆藏清康熙甲寅年地契考释 / 甘超逊

都市寻踪



45 武汉兴起 30 万封抗战慰问信运动 / 汪梅梅

48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六） / 刘宝森

53 老武汉年俗童谣：忙年 / 彭翔华

57 抗战英雄谢晋元在南洋大楼举行婚礼 / 田联申

扫街探疑



58 武昌彭刘杨路上的“武汉行营” / 韩泽宽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zsl@163.com

1926，湖北农民运动潮涌大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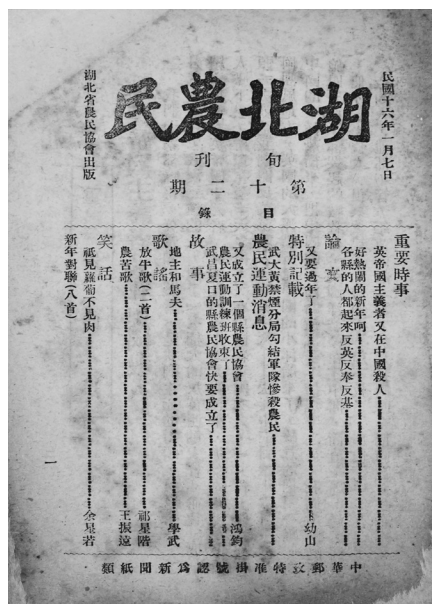
◇ 曹波 肖诗静

轮印：100年。1926年1月2日，湖北省临时农民协会成立，随后创办机关刊物《湖北农民》，荆楚大地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走在全国前列。

在武汉革命博物馆“探索与奠基”展厅，展示着几本泛黄的《湖北农民》期刊，纸质铅印，纵18.5厘米，横13厘米，32开本，排版紧凑，设计朴素，具有早期革命书刊简洁实用的特点。封面顶部由右至左印有“湖北农民”大字刊名，一旁标注“湖北省农民协会出版”和出版日期。刊名下方是“旬刊”和期号。由于期数不同，部分封面印有“每份零卖铜元二枚”“代售处本省各大书坊”。

《湖北农民》创刊于1926年初，由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农民协会主办，初为半月刊，每期发行5000份。3月，因农民协会

遭军阀破坏，《湖北农民》仅出两期便被迫暂时停刊。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5月1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藏《湖北农民》第十二期封面

日又恢复出版，并改为更能及时反映斗争动态的旬刊，发行量一度达到约2万份，影响力迅速扩大。遗憾的是，随着1927年大革命失败，《湖北农民》在历时一年半后不得不停刊。《湖北农民》原版存世很少，目前武汉革命博物馆馆藏三本珍贵原件，均为1980年代征集而来。

在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创办的众多期刊中，《湖北农民》具有代表性，充满革命激情，蕴含丰富智慧，见证斗争历程。

共产党人领导农民运动

《湖北农民》的创刊，与1920年代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演进有着密切关系。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大会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第一次提出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首次明确将农民（小农、佃户、雇工）列为革命力量，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参与者，这为农民运动明确了斗争方向。农民运动从自发的“抗租抗税”，升级为有明确政治目标的革命行动。中共三大之后，开始系统推进农民工作，直接促成了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的广泛建立和农运干部的大力培养。

1924年1月，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大会通过《对于农民运动之宣言及政纲》，强调在国民革命中发动农民的重要性，开展农民运动成为国共两党共识。

1925年1月，中共四大第一次明确提



武汉革命博物馆“探索与奠基”展览序厅

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肯定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重要作用。大会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

湖北是继广东和浙江之后，全国农民运动发动较早的少数省份之一。湖北党组织吸取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的教训，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开展革命。从1923年7月开始，有计划地派遣党团员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并开展革命宣传。1925年，湖北遭受严重旱灾，民生困苦，“逼起各地农民发生暴动，如索债吃大户，抢租劫仓之事时有所闻”。与此同时，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渐高涨。为加快发展农民运动，湖北党组织决定成立暑期临时委员会，号召各地党团员特别是暑假返乡的进步学生，揭露“天灾人祸”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地主，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1925年7月，由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农民运动议决案》，确定开展农民运动的方针和办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随即成立了以共产党员陈荫林为部长的农民部。此后，中共湖北地

方组织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通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领导全省农民运动，湖北农民运动由初期发动进入系统组织阶段。

不久，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所属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努力下成立。与此同时，中共武汉地委也与共青团武汉地委联合成立以陈荫林为书记的农民运动委员会。此后，湖北农民运动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利用国共合作形成的统一战线环境，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至1925年底，已有黄梅、黄冈、黄陂、枣阳、黄安、阳新、沔阳、汉川、随县、广济、荆门、钟祥、江陵、麻城、襄阳、宜昌、天门、通山、远安、孝感、京山、崇阳、新堤等县市建立党组织，一些农运发展较快的县开始领导建立农民协会。至1925年底，全省登记在册的农协会员已有5000人以上。

《湖北农民》列为农讲所教材

1926年1月2日，湖北省临时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武昌抱冰堂举行，由中共武汉地委主导组建，陈荫林、李子芬等党员担任执委，实现了对农民运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协会明确主张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之机关，拥护农民利益，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在此基础上，《湖北农民》作为机关刊物创刊，成为重要宣传阵地。随后，中共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由陈荫林主持，进一步加强对全省农民运动的领导。然而，在北伐军到来之前，湖北农民运动还处于不公开的状态，地主劣绅利用其武装力量，压迫农民协会，破坏农民组织，拘捕农协骨干。3月，省临时农民协会被反动军阀政府查封，《湖北农民》被迫停刊，“属部前被查抄，文件散失，干事仍在狱牢，负责人不能自由行动，

以致工作上受重大之打击而暂时停顿”（湖北省党部农民部1926年3、4月份报告）。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和农民运动的高涨，湖北农民运动迎来转机。为加快湖北农民运动的发展步伐，加强湖北党组织的农运领导力量，决定派专人到汉指导湖北省农协工作，继续出版《湖北农民》，并创办《农民画报》《湖北农民运动》，通过加大发行力度，努力培养农民的革命自觉性与战斗力。

12月初，毛泽东来武汉筹备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北农民》列为理论学习教材。陈荫林参与筹备并主讲关于农民运动的组织课程，向学员阐明“农民协会的组织，是集合农村中被压迫的人们，共同向封建势力进攻，在这种政治斗争中，农协又是农村中的一个革命的联合战线”。

1927年3月4日，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的执行委员会，陈荫林等17人为执行委员，这次大会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鲜明主张。后来党的八七会议指出：“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直到今年三月的湖北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3月底，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代表在武昌召开联席会议，选举毛泽东、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以武汉为中心，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这充分说明湖北省农协在全国农民运动中的重要地位。7月，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集团“分共”，开始镇压工农运动。8月，湖北省农协被改组并下令“停止各级农协活动”。《湖北农民》随之停刊，尽管生命短暂，其历史作用却不容忽视。

农民喉舌担当核心宣传阵地

《湖北农民》创刊之初就确立办刊宗旨：“系统的教育及宣传机关，文字以浅近通俗，便于农民阅览。”刊物“由各县农协分散及张贴”，以湖北地区广大农民为核心受众，兼顾农村基层干部和农协成员。

《湖北农民》面向广大农民，开辟有重要时事、论文、农民运动消息以及特别记载、名词解释、故事、歌谣、笑话等多个栏目，每期15-30页不等，内容单篇篇幅短，语言通俗直白，贴合农民文化水平与认知习惯，深受农民欢迎。它不仅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载体，更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教育农民、动员农民、组织农民的重要作用。

（一）形势分析与革命启蒙

作为湖北农民运动的核心宣传阵地，《湖北农民》担负着连接党组织与农民的纽带这一重要使命。“重要时事”栏目每期3至5则不等，及时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重要政策，帮助农民了解斗争形势，激发革命热情。

1926年至1927年，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干涉，特别是英国在汉口、九江等地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湖北农民》敏锐抓住这一时机，在第十二期发表《英帝国主义者又在中国杀人》，详细报道帝国主义暴行，号召农民起来反抗。报道中说：“英帝国主义者，终不甘心让中国人爬起来，拼命的要想把中国人压下去，所以在这十天之内，又在中国杀了两次人，一共杀了四五百。”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报道，有效激发了农民的爱国热情和斗争意识。

同期“重要时事”另一条报道《各县的人都起来反英反奉反基》，直接揭露帝国

主义与军阀的暴行，号召群众进行“反英、反奉（奉系军阀）、反基（实指基督教文化侵略）”的斗争，将国内国际重大事件与农民自身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

内容高度聚焦湖北本地农民运动，是《湖北农民》的一大特点。“农民运动消息”栏目，实时报道各地农协组织的农运成果，起到推动农民协会壮大、农民斗争深入的作用。如《天门第七区农会反对劣绅大运动》《武昌县农民协会成立》《孝感近来的工作》《安陆县第一区农协成立了》《又成立了一个县农民协会》《武昌夏口的县农民协会快要成立了》《各县农民协会纷纷成立》《蒲圻农民的两个斗争》《阳新惨案的凶手又枪毙了十个》等，十分直接且具体报道全省农民运动的进展，传播经验，树立榜样，鼓舞士气。

《湖北农民》偶尔还开设“特别记载”栏目，同样报道的是全省农运状况，但更像一个曝光台，如《武大黄禁烟分局勾结军队惨杀农民》等文章，揭露反动势力对农民的迫害。

（二）理论传播与实践指导

《湖北农民》以解决农民实际问题为导向，“论文”栏目的编辑撰稿者，多以张学武、王振远等在农村实际领导农运的共产党员为代表。他们有一定理论素养和农运实践经验，通过分析时局、解读政策，向农民阐释为什么要斗争及怎么去斗争，从而提升农民的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指导运动的方向。

第十四、十五期合刊刊登的《农民协会的意义》，阐述农民协会是为农民本身谋利益的，农民只有通过农民协会组织才能打倒欺压他们的反动势力，才会有翻身的日子，推动湖北农协的壮大与农民斗争的开展，实用性极强。

《农友们不要三心二意》告诉湖北农民痛苦的由来和解除痛苦的方法，说明农民协会是为农民解除痛苦的组织，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为什么要农民自卫军》深刻阐明建立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深入浅出地把农民协会比作种田佬的田地，把农民自卫军比作犁锄，“我们应该把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看得跟田土和犁锄一般的重要”。

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在1926年3、4月份的报告中作出指示：“向各县农协解释‘五一’与中国农民，并指挥各县农协在‘五一’举行相当的运动，向各县农协（解）释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的意义”。《湖北农民》第三期按照该指示刊登《“五一”节告中国农民》《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意义》《庆祝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等文章，向农民介绍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内容和意义，进一步唤醒农民的革命意识。

1927年2月7日，第十四、十五期合刊专门发表《武汉三镇的“二七”纪念》文章，指出“武汉三镇的人，在二月七日这一天开了很大的纪念会”“到会的民众都下定决心要打倒屠杀京汉路工友的英帝国主义

者和吴佩孚”。在《“二七”纪念与农民的关系》中进一步阐述了工人和农民原来是一家，农民只有和工人紧密结合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才能为自己谋解放。

在与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农民自卫武装继续壮大。1927年5月，第廿一期《省农协开办农民训练班》就是省农协针对麻城会匪暴乱发出的号召，“训练一批很能办事的农友出来”“一期训练三百人，特别注重操练”，激发农民团结自卫反抗土豪劣绅。

《湖北农民》偶尔开设“名词的解释”栏目，如《标语》解释“标语”的定义，强调“标语是我们自己的”“做得到与做不到，全在我们自己齐心不齐心，努力不努力”。《土豪劣绅》则在释义的基础上，细致对比“土豪”与“劣绅”的差异，揭露了他们的共同本质“都是压迫剥削我们农民的，都是我们农民的仇人，我们都要打倒才好”，将革命理论进行通俗传播。

（三）文艺宣传与斗争鼓动

《湖北农民》最具特色的部分是“故事”“歌谣”“笑话”“谈话”“调查”等栏目，内容多为农协会员和县、区农协负责人投稿，用最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进行宣传，成为农民自己的发声渠道，

显示出强烈的群众性和实践性。

第十二期“故事”《地主与马夫》：地主看不惯辛苦的老农夫休憩还大骂他懒惰，马夫替老农夫打抱不平，指责地主“人家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所做出来的东西，却



武汉革命博物馆“探索与奠基”展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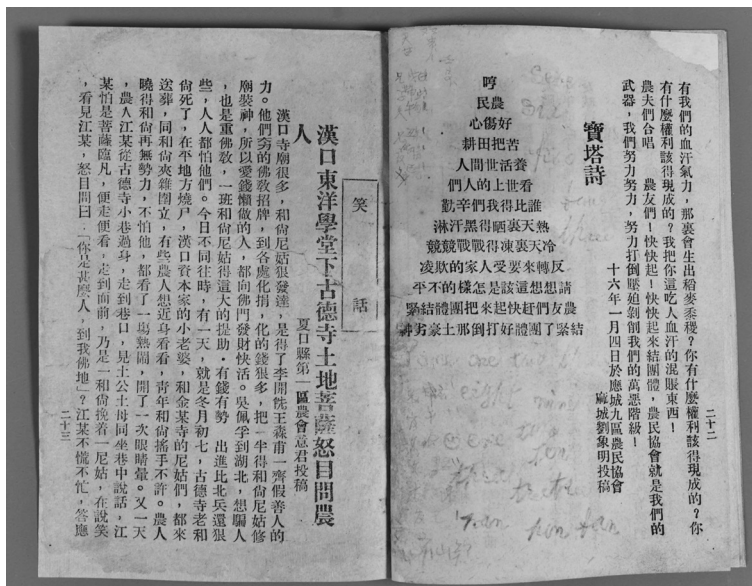
要送把你享用，你还说人家懒惰，是该冻该饿该穷的”。第十四、十五期合刊《蚂蚁的故事》，歌颂了蚂蚁的团结精神，以监利车湾水灾的惨痛教训警示农友“我们组织农民协会，也要像蚂蚁结团体一样，团结得紧紧的……我们才不致被土豪劣绅冲散，才可以完全打倒土豪劣绅，解去痛苦”。应城九区农民协会歌谣《地主与农夫》中，地主认为血汗气力是农人的，稻麦黍稷是地主的；农人反驳说田地原来是天生的，没有农人的血汗气力哪会生出稻

麦黍稷，你有什么权力该得现成的？并号召农友们快快起来团结拿起农民协会的武器，努力打倒压迫剥削我们的万恶阶级。“地主和农夫”直接点明阶级对立主题，强化农民的阶级意识，传递的是斗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

为了让农民了解其痛苦的由来和解除痛苦的方法，《湖北农民》通过“歌谣”代表湖北农民向社会各界诉苦。第十二期刊登王振远的《农苦歌》，通过对比农民和官僚地主不同的生活场景，号召农民积极站起来同官僚地主的压迫做斗争。第二十二期刊载黄安县农民协会会员袁仲扬创作的戏曲唱段《妇女解放》，唱出了妇女对旧社会的痛恨和对新社会的期盼。

第十四、十五期合刊中还出现了一首形式新颖奇特、内容饶有趣味的“宝塔诗”，文字排列呈现宝塔型，吸引力强。这首“宝塔诗”描述了农民生活的水深火热，揭示产生这种状态的深层原因，号召农民们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

第十二期发行时正值新年，刊登《新年



《湖北农民》第十四、十五期合刊刊载的“宝塔诗”

对联（八首）》，利用对联的形式，将“铲除贪官污吏，拥护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等革命口号，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在“笑话”中，《只见萝葡(卜)不见肉》则用幽默方式，讽刺不公正的社会现象。

《湖北农民》在办刊过程中，充分体现“农友杂志农友办”的方针，充分激发农友参与办刊投稿的积极性，注重用平实活泼的语言和读者保持积极的沟通。正如第十四、十五期合刊编辑处启事所说：“我们虽仍力想使他合乎各位农友的胃口，但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很小……希望各位农友时常来信指教。再者有许多农友，投来很多好的稿子，这是我们所顶快活的，还是希望各位农友多多的寄来……”

《湖北农民》上接天线——通过“时事”“论文”等传达革命形势与理论，下接地气——通过“消息”“记载”报道本土情况指导斗争实践，深入人心——通过“歌谣”“笑话”“对联”等进行情感动员和思想启蒙，构建了一个层次分明、立体化的宣

传体系，成功将党的政策、革命理念与农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紧密结合，有效履行了“农民的喉舌”和“战斗的号角”使命。

《湖北农民》的创刊与影响力不断扩大，是大革命时期荆楚大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历史见证，也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奏响了序曲。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著：《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

[2]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

[3] 高熙编：《中国农民运动纪事》(1921-1927)，求实出版社，1988年。

[4] 人民出版社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

[5] (苏)A.B.巴库林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6] 李良明、孙泽学著：《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中共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7]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

[8]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9] 武汉革命博物馆编：《武昌农讲所馆藏文物精粹》，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

[10]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百年荣光 初心永恒：中共武汉历史大事

记1921-2021》，武汉出版社，2021年。

[11] 陈富安、谭克绳编著：《湖北农民运动史(1923-1927)》，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12] 胡玥、王灿发：《大革命时期农民报刊的话语生产与社会动员(1926-1927)》，《甘肃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1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14] 梅学书著：《鄂东农耕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15] 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编：《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武汉出版社，1997年。

[16]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著：《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17] 《汉口民国日报》，1926-1927年。

曹波，武汉革命博物馆研究馆员；肖诗静，武汉革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履职路上的“三部曲”

◇ 李运玲

人物名片：李运玲，农工党武汉市委
专职副主委，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兼）。

我2006年加入农工民主党，今年是第20个年头。二十年来，我的角色从奔走一线的区工商联主席，到聚焦难题的区政协副主席，再到凝聚智慧的专职副主委。角色在变，但用脚步丈量民情的初心没变。

我曾见证一条大道从“盆景”变为繁华，聆听一个产业在挣扎中寻求突围，也为一群毕业生的迷茫找寻答案。这履职路上的“三部曲”，始于街头巷陌的烟火气，最终汇入城市发展的交响乐。

区工商联主席：步履不停，调研中见真章

2016年底，中山大道改造后重新开街，成了武汉的“网红”。可没多久，问题凸显，路是漂亮了，可客人没了，投诉不断。南京路至六渡桥段属于交通严管路段，社会车辆（包括的士）分时段才能通行，临街商户业态低端，人流量锐减。

一位在南京路经营多年的老商户满是焦虑，“的士不让随时停，游客不方便来，我们这些店都快成‘盆景’了！”他望着空荡店铺发愁的样子，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作为江汉区工商联主席，我组织团队进行调研。那个冬天，我们带着笔记本，一家家敲门。包括卖了几十年热干面的老师傅、新潮服装店的年轻店主、老字号餐馆经理在内的300多家沿街商户，诉说着同一个困境：美丽的严管街，成了现实的“拦路街”。

我们不能只造“盆景”，更要培育“生态”。在一场又一场的座谈会里，这个想法越来越清晰。通过召开不同群体座谈会，一份万字的调研报告《中山大道商业环境和产业提升规划》诞生了。

通过党派及市区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2018年，的士终于能在中山大道全时段通行，许多数据和观点现在还在被不同部门采用。老商户们欣喜地告诉我：人气回来了！

我深深感到：一份提案，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街头的烟火气。



探访汉派服装门店

2019年，我走进一家汉派服装的老厂。车间里，老师傅的手艺依然精湛，但厂长脸上却不见笑容。

“李委员，我们的服装质量不比南方差，可为什么‘汉派’牌子就是叫不响？”他摩挲着一件大衣的布料，苦笑着说，“年轻人总觉得我们‘土’”。

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汉派服装的困境，不仅是生意，更是一座城市的自信。我决定为它们“代言”。

那个夏天，我一边查阅参考文献、查找数据资料，一边实地走访不同的服装企业，还召开了两次服装企业座谈会，听取一线企业家对汉派服装发展的建议，了解汉派服装发展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我成了服装厂的“常客”。在一线车间，听到老师傅对工艺的坚持；在设计师工作室，看到年轻人对创新的渴望。最触动我的，是一位企业家的话：“我们缺的不是能力，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

调研，就是去发现这些“被埋没的光”。我把这些声音、数据和希望，写进《加快汉派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时尚之都的建议》，为汉派服装的发展及提升影响力提供

思路与对策。《建议》获得2019年度农工党湖北省委会调研报告一等奖，但比奖项更珍贵的，是厂长后来发来的短信：“报告里的建议，我们正在一条条尝试。谢谢你们为我们说话。”

那一刻我明白，我的工作，就是当好这座城市的“翻译官”，把产业的挣扎，转化为改革的号角。

区政协副主席：聚焦难题，建言中促实效

2021年12月至2023年4月，我出任洪山区政协副主席。上任后“第一把火”，是针对社会上“就业难”和“用工难”的困境，就高职教育与企业之间的产教融合进行深度调研。

我站在武汉一所职业学院的校园里，面对一群即将毕业的学生。他们的眼睛里，有憧憬，但更多的是迷茫。一个学生怯生生地问我：“李主席，学校教的，好像和企业要的，总差那么一点。我们出去真的能找到好工作吗？”

这个问题，我无法轻易回答。它背后是“就业难”与“用工难”并存的结构性困境。我必须找到那个“差一点”到底差在哪里。

我带着这个问题，组织部分区政协委员走访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区科学技术和科技信息化局、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武汉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开展本土调研，还远赴江苏苏州、宜兴“取经”。在苏州一家高科技企业，人事经理指着先进的设备说：“我们急需能操作这些机器的人，但毕业生往往需要重新培训。”

问题就出在“产教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回到武汉，我们撰写的报告《关于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 促进区高职院校毕业生高质量



李运玲

就业》,对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和产教融合进行了全面分析,为产教融合发展及提升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思路与对策,得到区委书记的签批。

彼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提问的学生,我希望,因为这份提案,他和同学们的未来,能少一点“差一点”,多一点“刚刚好”。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那时外表看起来气派的写字楼不少,但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有的楼层空置率挺高,冷冷清清;入驻的企业也是五花八门,有搞培训的,有开小贸易公司的,就像是“大杂烩”,彼此之间没啥关联,形成不了合力。

为把情况摸清楚,我带着团队开展“扫楼”行动,一栋楼一栋楼实地去看,和楼宇运营方、入驻企业主聊天,听他们讲述酸甜苦辣;同时做线上问卷,扩大覆盖面,方便更多企业和相关部门表达看法和期待。

跑得多了,看得多了,症结就越来越清晰。和国内楼宇经济发展先进城区比,我们缺乏精准规划和产业集聚。好比说,你想发展金融产业,那就应该把相关的金融企业、

服务机构尽量集中到一两栋楼里,形成一个“金融圈”,这样信息、人才、资金流动才快,产业链才完整。而我们当时的情况,有点“撒胡椒面”,潜力没发挥出来。

我把这些情况、数据和比较,还有企业家的心里话,都揉进了报告里,从存量楼宇更新、增量楼宇高标准建设、楼宇产业集聚、招商引资体系以及配套及政策优化等维度进行分析思考,提出《加快发展楼宇经济提升经济承载力》的建议,供区领导决策参考。据了解,当时调研的数据至今还在使用。

专职副主委:架桥铺路,凝聚智慧发声

2023年5月,我调入农工党武汉市委任专职副主委,角色变了,从“提案人”变成了“组织者”,但初心未改。

作为一个新专干,我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当好服务员,核心就是“桥梁”和“枢纽”。一头连着全市农工党党员及其所联系的界别群众,另一头连着党委和政府。我的任务是把分散的、专业的智慧和诉求,转化为高质量的、可供决策参考的意见建议。

“专职”意味着全情投入。我的主要职责包括:主持机关的日常工作,组织策划参政议政活动,带领团队进行调查研究,协调内外关系,以及最重要的——将党派集体的智慧凝聚成提案、信息、调研报告等成果。

参政议政的生命线在于扎实的调查研究。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市委每年根据湖北省委会、市政协、市委统战部要求,围绕国家、省、市中心工作,结合党派自身界别特色,确定一批重点调研课题。

比如,2025年市政协议政性常委会,围绕1、2、3号建议案,我们组织专家团队深入东湖高新区、河南安阳、武汉农科院深

度调研，提出《关于推进关键创新要素融合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建议》《关于加快推进我市低空经济发展的建议》《关于依托“江城百臻”建设武汉农产品品牌矩阵的建议》等在常委会上作口头发言。

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收获巨大。我们不仅看到了政策文件上的数字，更听到了市场需求的声。调研报告的形过程，是不断讨论、碰撞、提炼的过程。我们要确保数据准确、案例典型、分析到位，最后提出的建议必须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截至2025年底，农工党市委共提交社情民意信息260篇。其中，全国政协采用10篇，农工党中央《信息专报》采用20篇；省政协采用43篇，省委办公厅采用2篇，省委统战部采用1篇，农工党湖北省委会采用251篇。7篇信息获得领导签批。我们有2名党员获聘农工党中央特约信息员。这种成就感，是实实在在的。

有了高质量的成果，还需要通过合适的渠道送达。我们主要依托几个平台：

一个是政协大会。每年政协会议，我们党派都会提交大会发言和集体提案。仅十五届四次全会期间，我们就提交集体提案17件、个人提案61件，是2号建议案提出单位，3篇提案获评“好提案”。内容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这些提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选题、调研、撰写、修改到最终定稿，往往要经过数轮甚至十几轮的讨论。作为专职副主委，我要全程组织、协调，有时甚至要亲自执笔或深度修改，确保逻辑严谨、文字精准。

另一个重要平台是政党协商会议。这是具有制度特色的安排，党委政府就重大决策、重要文件、人事安排等，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参加这种会议，压力更大，要求也更高。发言必须直击要害，言之有物。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会。关于“加大生育托育支持力度，完善促进生育政策措施”，我建议加上一句话：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这个建议被采纳了，让我很有成就感。

这几年来我最大的感悟是：责任重大。我们所提的每一个建议，都承载着党员的信任和社会的期待。必须严谨再严谨，负责再负责。“帮忙不添乱”是底线，但更高要求是“建真言、献良策”。这也要求我们不仅要懂专业，还要懂政治、懂政策、懂沟通。要善于在不同意见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将个体智慧升华为集体成果。民主党派的视角往往更超脱、更聚焦于长期性和结构性问题。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来自体制外、但又深入体制内的“建设性批评”和“前瞻性预警”，这种独特的视角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补充。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有人问我，履职路上累吗？累，当然累。调研路上披星戴月，写报告时字斟句酌。但当我看到中山大道重现繁华，汉派服装重拾信心，职校学生找到方向，写字楼焕发活力，那种欣慰，无法用语言形容。

参政议政，是一件“良心活”。它需要你静得下心、沉得住气，需要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爱得深沉。

前路还长，我依然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走下去。因为我相信，每一份真诚的建言，都是点亮这座城市未来的一束微光。

青山犹记：通山地方病防治亲历记

◇ 李胜洪

通山县地处鄂赣交界的幕阜山北麓，属于丘陵地带，山虽不大，但数量很多，全县地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人们常戏言：通山通山，通通是山。自古以来，由于交通不便，通山相对闭塞，因此在解放二十多年后，仍保留了一些比较落后的习俗，卫生条件很差。

再加上山多田少，人们的生活困难，地方病较多，如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粗脖子病”或“气颈”）、克汀病、头癣（癞痢头）、丝虫病、疟疾、血吸虫病、梅毒（多为隐性）等，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初到通山所见

1970年，我从湖北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通山县工作。最初的两个多月，我在港

路卫生所熟悉基层情况。十月上旬，忽然接到通知，要求自带行李到区卫生院报到，参加地方病普查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我们这批刚分来的大学生、部分赤脚医生，还有武汉市一轻局和二轻局下放干部中的医务工作者。

院长吴木喜在会上传达了县卫生局关于开展地方病普查的要求和安排。普查的病种是农村最常见的钩虫病、蛔虫病、血丝虫病、地方性甲状腺肿以及妇女子宫脱垂。虽然参与的都是医务工作者，但专业背景各异，尤其我们这些“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连寄生虫课都还没上过。因此，为了统一标准、保证质量，短暂的集中培训显得非常必要。

对我而言，这次培训是踏入公共卫生领域的第一课。钩虫卵和蛔虫卵在显微镜下还

算容易辨认，地甲病和子宫脱垂的分型分度标准也相对好掌握，最难的是丝虫病的微丝蚴鉴别。培训用的标本片似乎很陈旧，杂质多，图像模糊，我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反复观察，才能掌握微丝蚴的形态特征。

从培训到田野

培训结束后，我们被分成五个普查小组。我带领五名医生（包括两名赤脚医生）组成一组，每到一个公社，就负责一个大队的普查任务。

普查的第一站是石门公社，它位于楠林东北方向约十多公里的大幕山西麓。这里不仅有古老的茶马古道，还是湘鄂赣苏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当时全县交通工具极为匮乏，仅有的几辆吉普车是县领导的专车，区里领导都没车，我们更不用说了。

在吴院长带领下，我们挑着行李，沿着通往石门水库的沙石公路步行前进。我的担子一头是显微镜，一头是脸盆被褥，小竹扁担在肩上有节奏地闪动着。大家一路说笑，竟也不觉得累——毕竟那时年轻。

中午抵达公社，受到公社主任夏德章的热情接待。夏主任身材高大，头发稀疏，看得出头癣愈后的痕迹，说话声如洪钟，十分豪爽。午饭有酒有肉有豆腐，看得出公社做了精心准备。饭后，各大队负责人前来接人。我们组被分到朗口大队。

从石门街到朗口，是一条沿山势蜿蜒的古驿道，一侧是溪流，一侧是山岩。途中有一处险峻之地，突出的山嘴形似石门，或许这就是“石门”地名的由来。朗口大队有四个生产队、六个自然村，两百多户人家散居在狭长的平畈间。支书领我们在大队部安顿下来，安排好镜检室和妇科检查间，稍事休

息便投入工作。

说实话，这次普查让我既感到新鲜又有些忐忑。新鲜在于第一次参与如此系统的公共卫生行动；忐忑则因为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不仅是技术问题，更多是群众工作的挑战。普查率和受检率都是硬指标，如何完成任务，对我这个新手组长来说压力不小。

整个普查分三步走：首先，在支书和妇女主任协助下，我们到各生产队召开动员大会，宣讲普查的意义和疾病的危害，强调这是党和政府对群众健康的关怀，目的是摸清病情、为防治提供依据。特别是对丝虫病，我们重点讲解其由蚊子传播、可导致“橡皮腿”甚至丧失劳动能力的严重后果，并请已有症状的患者现场说法，增强宣传效果。

接着是逐户登记造册，要求一人不漏。我们拿着花名册走村串户，核对信息，工作繁琐但推进尚算顺利。

最难的是检查阶段。任务包括：收集每户社员（尤其是儿童）的大便样本查钩虫、蛔虫；对已婚妇女进行妇科检查以排查子宫脱垂（俗称“掉茄子”）；深夜十二点后上门采耳垂血查丝虫微丝蚴；以及为每个人检查颈部排查甲状腺肿。项目多、涉及隐私深，群众抵触情绪很大。

尤其是妇科检查，受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妇女躲躲藏藏，像“抓壮丁”一样困难。为此，大队不得不强力配合：安排妇女停工受检，对拒不配合者上门动员，甚至采取扣工分的措施。我们无奈地发现，在顽固的旧观念面前，苦口婆心的劝说起效甚微，而工分约束却立竿见影。

采血工作同样不易，半夜敲门常无人应答，队长不得不挨户拍门，软硬兼施。就连收集粪便，也需用工分挂钩来推动。这些“土

办法”虽显生硬，却有效地加快了进度。粪检中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插曲：有人用塑料袋包来两三斤“样本”，也有人用纸裹了十几层，打开却只有黄豆大小的一点。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量极大。白天镜检粪便样本，查找虫卵；晚上背着显微镜上门，现场采血，当场镜检。记得第一次在镜下看到血液中微丝蚴如小蚯蚓般蠕动时，我兴奋极了，这可是活体标本！随着血液凝固，虫体渐渐不动，我滴上一滴生理盐水，它又苏醒过来。我连忙请献血者亲自观看，他看得胆战心惊，抵触情绪顿时消散，后来还成了义务宣传员。我将那片阳性玻片精心保存下来，视若珍宝。

经过努力，朗口大队的普查率和受检率均超过95%，除了外出人员，几乎无人漏检。与别组相比，成绩显著。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实战锻炼，积累了宝贵经验，后续在其他公社的普查工作顺畅了许多。历时一个多月，全区七个公社的普查任务圆满完成，查出的患者也陆续得到治疗。

基层见闻与职业转折

这次经历深深触动了我。山区群众的生活依然贫困，地方病发病率高得惊人，尤其是儿童钩虫、蛔虫感染率超过80%，严重影响着他们的生长发育。这一切，与生活条件、环境卫生及陈旧习俗直接相关。改变现状，任重道远。也正是这段深入基层的经历，让我对公共卫生工作有了初步却真切的认识，为我此后调入县防疫站、投身更系统的地方病防治事业，埋下了伏笔。

在防疫站工作四年多后，我真正认识了防疫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看到那些克汀病人呆傻的面容、过着非人的生活，让我心

生恻隐。一次，我在宝石乡石壁湖看到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像牲口一样被拴在门前的树上。了解后才知道这是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后遗症的病人，如果不栓上，他可能会直接往河里冲。那些孩子冷漠的面孔和家长凄凉无助的眼神，深深刻在我的心里，以至几十年后的今天还能清晰地浮现出来。

这些事实完全颠覆了我原有的认知。我曾以为搞防疫不如搞临床，如今却明白，抓好卫生防疫工作是改变农村卫生面貌、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途径。与临床医生相比，防疫工作毫不逊色，甚至意义更为深远，毕竟防疫医生开的是“大处方”。

一场偶然引发的头癣防治战

1980年，我调任通山县防疫站（现疾控中心）担任主管业务的副站长。此时通山还是个地方病多发、发病率较高的地方，尤其头癣发病率最高。当年统计显示，患者约占全县总人口的8.2%，约2.4万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儿童和青少年。给外人的第一印象是通山“癞痢头”多，这不仅影响容貌，更损害了青少年的健康。

消灭头癣的任务，是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提出来的。那是1997年的春天，县委书记张海涛在大路公社驻队。当时驻队实行“三同”，即在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

张书记住的那家农户有两个小孩，大的有十多岁，小的仅五岁左右，但有个共同点，都是癞痢头。大的头上还有些头发，小的却满头癞疮，白花花的一片。每到吃饭身体发热时，头上奇痒难忍，小孩子就放下筷子，双手在头上抓搔，抓得白色癣屑到处飞，有的落入饭碗菜碗里，张书记实在难以吃下去。

回到县里，他把卫生局局长找来，要求

必须治好这个队的头癣。卫生局把这个重担交给了防疫站，由此拉开了头癣防治工作的序幕。

防疫站接到任务后，立即开展防治工作。首先，下去搞清这个小队到底有多少癞痢头，登记造册，以便组织药物治疗。摸清情况后，发现解决问题并不简单：一是家长不愿意给小孩治疗，认为癞痢是“出火气”，治好了火气无处发，会生其他的病；二是病人不配合，孩子们见了我们就跑，像见到鬼子进村；三是群众认为，“癞痢十八”，长大之后自己就会好，没必要去治疗。

刚开始治疗时，我们以为口服灰黄霉素配合维生素AD（鱼肝油）就行了。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发现效果并不理想，有的治好了又复发。在摸索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只要病灶不除，不仅疗效差，复发率也高。于是我们开始给病人剃头脱发，还研制出以硫磺为主要成份的脱发膏，帮助病人洗头脱发，并督促病人的衣服、帽子、毛巾都要消

毒。这样一来，效果显著。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出了一套治疗经验，即“脱、洗、擦、服、消”五字方针：脱发、洗头、擦硫磺膏、服灰黄霉素和鱼肝油、消毒衣帽。

不久，该小队的头癣全部治愈。公社随后强烈要求我们扩大战果，帮助治疗全公社的头癣病人。由于药物和经费不足，我向咸宁地区防疫站请示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防疫系统的药品均由省站直接下拨，若要治疗全公社，药物需求更大。为此，我和卫生局长一同前往省站汇报前期治疗经过与成效，并提出再治疗一个公社的药品申请。省站领导非常重视，要求我们在全县铺开，作为全省试点，并在药物、经费、技术上给予大力支持。

翻山越岭的防治之路

回县以后，我向主管文卫的县领导作了汇报，领导批准了我们打一场消灭头癣的行动方案。

首先是组建医疗队伍，我们从全县各级卫生部门抽调了八十多名医务人员和一百多名赤脚医生，组成浩浩荡荡的防治大军，集中在县城进行专业培训，要求熟练掌握头癣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承诺“任务不完，队伍不散”。

随后分组下到各区、公社，分片包干。下去后，先是广泛宣传，大造声势，把头癣的危害讲清，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讲明，把治疗



通山大畈卫生院院长朱溶汉在诊治病人

的方法讲透；然后严格进行普查登记，力争治疗不漏一人。

全面铺开治疗的工作量很大。尤其山区居民居住分散，有时一个山头只有几户人家，爬上爬下要几个小时。医务人员天天跋涉，从不懈怠，经受住了巨大考验。大家不怕脏、不怕累，忍受着头癣的腥臭味，为病人洗头擦药毫无怨言，体现了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和高度的事业心。

我们防疫站的医生负责技术指导和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商量解决和处理。作为主要责任人，我跑遍了通山的各个乡村，翻越大小山头，穿梭于湖北与江西间的崇山峻岭。

一次，我在山界公社由西圩大队前往黄金大队的山路上跋涉，几个小时才爬上山顶。同行的公社医生黄壬午告诉我那就是大风口，也叫湖北口，真的是风口浪尖，风势极大。山上有个凉亭和一个大茶桶，是为方便过往行人设的。站在大风口放眼望去，一边是江西，一边是湖北，真是一脚踏两省。四周莽莽苍苍，山峦叠嶂，薄雾飘渺，令人心旷神怡，爬山的疲劳顿时消散。

休息片刻后开始下山。沿途茅草丛生，山路崎岖蜿蜒，随处可见山蚂蝗，不时有蛇虫爬过。黄医生告诉我，大革命时期这里曾是红军活动的地方。想到当年红军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坚持革命，感慨万千——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愈往下走，林木愈



李胜洪（右一）在通山治疗

茂密，最后下到谷底的山垄，沿山垄是一条通往江西的古驿道。这里有个自然村叫大余村，曾是红三师的根据地。一堵墙上仍保留着红军的“八大纪律”和标语口号，鲜红的字迹依然醒目、神圣。

我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凝视着这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留下的印记，脑海中浮现出他们在艰难困苦中与强大敌人浴血奋战的场景。那一刻，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刻在我心上。

锦旗背后的人与事

这项工作在省地站的支持下，通过全县广大医务人员三年的努力，终于达成基本消灭头癣的目标，并摸索出一套治疗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后来通过了卫生部和省地主管部门的检查，普查率、治疗率和治愈率均在95%以上。

1982年，由卫生部邵副部长带队，省、地防疫部门参加的检查验收小组来到通山。

他们首先听取了我县治疗头癣工作的情况汇报，包括在治疗过程中摸索出的治疗经验，以及三年来不断努力取得的成效。然后检查组下到楠林大坪和横石实地检查。

在楠林大坪，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显得十分靓丽，而她以前是满头的癞疮。检查组的同志在她治疗前的照片面前赞叹不已。在横石，防疫医生郭慕和组织了七十多名原头癣患者，一个一个对着照片介绍治疗情况，治疗效果得到了检查组的高度评价。

经过中央和省地防疫系统的检查验收，通山县的头癣治疗工作经验由卫生部向全国推广。卫生部专门授予一面“头癣防治先进单位”锦旗，以示褒奖。

除了头癣，通山还是梅毒高发区。由于解放前遗留的陋习，隐性病人不少。因此，每年征兵时，通山兵源必须检查康华氏反应，以筛选带病者。在省地站的安排下，我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梅毒查治工作中。这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通过组织力量全面调查、重点筛选，对现症和隐性病人进行根治，历时两年取得了消灭梅毒的成果。此后，通山兵源的康华氏反应改为免检。

经过多年的计划免疫工作，天花被消灭，小儿麻痹症基本消灭，疟疾传播得到控制，乙脑、麻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的发病率几乎降至零。这些成果有力保护了儿童的健康与生命安全。

这些工作的成效，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每年持续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地方病防治提供了坚实保障。正如当年毛主席得知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提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中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深切流露了他对人民疾苦的



退休后的李胜洪

关怀之情。这份忧民爱民之心，情深似海，始终激励着我们。

几十年过去，每每回想起那段岁月，就感到人生没有虚度。能做几件对人民有益的事，我终身无憾！

李胜洪，曾任通山县防疫站副站长

从讲台到兰台：我的深耕与追寻

◇ 吴先华

人物名片：吴先华，市政协委员，市档案馆副馆长。

回首三十年的职业生涯，犹如一段不断“转场”的旅程。从三尺讲台到行政工作，从图书馆到档案馆，岗位在变、舞台在变，但“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的那份执着始终如一。回望来路，仿佛翻阅一本厚重的相册，有感慨，还有欣慰，更有感恩。

与职业教育的不解之缘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一个近乎“传奇”的起点。1994年，我从中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却因一场黄疸型肝炎，错失多个面试机会。困顿之际，我想起家乡恩施建始县的《建始名人录》——当年我的高考语文成绩位列恩施地区第一，名字有幸被收录其中。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给名录上一位在东西湖某校担任校长的老乡寄去一封自荐

信。未曾想，这封信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仅凭一份简历，我便被推荐至东西湖职校，成为该校最早的一批本科毕业教师。回望那一刻，依然感念那份不甘平凡的勇气，为我叩开了职业教育的大门。

在东西湖职校，我担任班主任，讲授语文，全心投入教学。后因家庭原因，调至一冶教育培训中心。原以为自己会继续专注教学，学校领导却从我身上看到更多可能，将我引荐向行政岗位，理由是我“文笔好，做事踏实”。自此我踏上了行政之路。

没想到，这一脚踩进去，就再也没能完全拔出来。我在一冶教育培训中心、一冶职工大学、党校都工作过，从秘书到招生就业，各方面都有所涉猎。最让我有成就感的，还是在武汉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担任招生就业处处长的那些年。

2004年，学校刚更名，全校仅511名学生，而我接到的任务是次年招生5000人。这看似不可能，我却选择以“笨办法”破局：安排人员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走访，而我自



吴先华在武汉市档案馆前

已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在外奔波，目标不是生源，而是“出口”——企业。

我带领学校各学院的负责人，走访中冶集团遍布全国的66家企业，一起召开座谈会，倾听毕业多年的学生和企业领导的心声。意外发现一个共识：学生的沟通能力在实际工作中非常重要，远比书本知识更能决定职业发展。这个发现让我豁然开朗，随后我把这些调研成果做成报告，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发出呼吁。

我很少去高中“求”学生来上学，而是把精力全用在深耕企业、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上。功夫不负有心人，武汉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两旺。2012年，省教育厅还专门让我们学校作为高职高专的唯一代表，在全省就业工作会上做经验交流。看到孩子们顺利走上工作岗位，那种成就感比什么都强。

后来，学校合并到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我调任学校图书馆馆长，依然在用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思路开展工作。此前，图书馆都是学生下课后就闭馆；我到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延长开放时间，最后做到全年无休、全天候开放。后来又琢磨着怎么把学生吸引到图书馆来，创办“读书月”，每个月都举办活动、开展讲座，还把央视主持人朱迅请来做了新书首发。

几年后，有人评价我们这所职业院校的图书馆“在全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赞誉背后，我更加坚信：心系学生发展，工作方能做到极致。后来我又回到招生就业处当处长，也是秉承这种理念。

在党政办公室主任位置上，我把学校里里外外的制度都梳理了一遍，修订、废止了上百项规章。还力推无纸化办公，改造智能会议室，所有会议材料都在数字屏幕上显示。刚开始施行时还挨了不少批评，大家说不习惯，但我明白这就是趋势。后来大家适应了，反而离不开了，工作流程也更规范、更高效。

在“为党管档”中找到新价值

2024年，我来到市档案馆任副馆长。从热闹的校园，到沉静的档案库，多少有点不适应。但我这个人，还就有股“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轴劲儿。

我潜心学习档案法规，系统掌握业务知识，随后组织全面清点馆藏，摸清家底。在外人眼中，档案馆是“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清闲之地。实则不然，我们既要直面上级巡察提出的问题，也要应对内部运行规范化的挑战。

我牵头逐项修订制度，仅分管领域就完善三十余项。有人劝我勿太较真，但我坚信，

管理不能靠人情，而应靠制度。唯有科学规范，事业才能行稳致远。

档案工作不止是整理故纸堆，更承载着重如千钧的社会责任。曾有一位职工面临退休，工龄认定需原始入职材料。我们在档案馆馆藏老名册中帮她找到了依据，化解了难题。那一刻，我深刻体悟“为国守史、为党管档、为民服务”十二字的分量。我们守护的不仅是纸张，更是历史的凭证与人民的利益。

馆藏档案百万余卷，皆为珍贵财富。这些年来，我们策划出版《烽火家书》，筹备《武汉来了个洋厂长——格里希影像志》等，旨在激活沉睡的档案，让它们开口说话，向今天的人们讲述武汉的开放精神与奋斗历程。

我们还通过了国家高水平数字档案馆验收，成为全国副省级城市首家。下一步，我们还准备全面清库，为档案数智化转型筑牢数据基础。我最大的愿望，是在未来几年推动本馆跻身副省级城市业务评价第一梯队。

委员身份是荣誉，更是责任

除了本职工作的“转场”，我还有一个光荣的身份，武汉市政协委员。当委员，对我来说是份意外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我提的提案，大多还是跟我干了半辈子的教育有关。2022年，教育部刚提出“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个概念，我就立刻着手调研，提交建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提案。该提案被评为年度好提案，推动了“中国车谷”和“中国光谷”两个产教联合体的成立，其中一个还成了国家级项目。这让我相信，只要建议提得准、有操作性，就能真正推动工作。

最近，结合在档案馆的工作和日常观察，我又在思考一个新的问题。我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专升本不考语文，考研也不考语文，调剂的时候甚至只看英语成绩。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不是说学英语不重要，而是觉得，在我们大力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是不是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一个博士生，如果连一篇文从字顺的总结都写不好，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我真希望，未来我们能看到街上有更多的朗诵班、演讲班，而不是清一色的英语培训班。这或许就是我这个“老教育工作者”和“新档案人”的一点执念吧。

回首三十年，我从一个想站讲台而不得的青涩毕业生，到如今在档案世界里寻幽探赜的副馆长，每一步看似偶然，却又仿佛必然。我这个人，没什么诀窍，就是领导交给我的事，我千方百计把它做好；到了一个岗位，就爱上这个岗位，把它当成自己的责任田来精耕细作。

如果说有什么经验，那就是：做事要有目标，管理要靠制度，队伍要用心带，困难要敢于上。我常对部门的年轻同事说，要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是渴望进步、渴望价值的，领导要做的，就是了解他们的长处，让他们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和成就感。

三十年很长，长到足以让一个行业沧海桑田；三十年也很短，短到仿佛昨天我才写下那封自荐信。未来的路还长，我还将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耕耘与守望。只为不负初心，不留遗憾。

让“黄陂造”走向世界

◇ 秦 尧

人物名片：秦尧，黄陂区政协委员，武汉柏凯生物有限公司总经理。

十八年，仿佛弹指一挥间。我的故事里没有惊天逆转，有的只是在困难前不放弃的韧劲，是把硬骨头啃下来的执着。我与柏凯共同走过的这条路，或许就是“黄陂造”一步步走向世界的缩影。

1.5 米展位叩开世界大门

2006年大学毕业那会儿，同学们大多涌向稳定单位，我揣着做家教攒下的两三百块钱，心里就一个念头：不想过那种一眼就望到头的日子，于是告别老家红安，奔赴上海。

工作后，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车间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凭着这股钻研劲儿，我成功改良了一项工艺，为公司省下不

少成本。老板拍着我肩膀说“这小子能成！”那一刻，心中涌起一股豪情，有了创业的冲动。

婉拒老板的挽留后，我回到武汉，在盘龙城租下1800平方米的厂房，创立“柏凯生物”。现在回想，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以为产品造出来就能变成钱，完全没想过客户在哪里，市场又在哪里？现实的冷水很快就泼了过来，我一个行业新人，没人脉、没渠道，50万本金像阳光下的冰块迅速消融，企业很快就濒临倒闭。

为让公司活下去，我只能白天在车间打样，晚上抱着电脑给全球潜在客户发邮件。十封信里，有九封都石沉大海，或被当作垃圾邮件。那种石投大海般的渺茫感，至今触动着我。

2008年初，揣着最后的希望，我带着公司研发的样品奔赴广交会。我把近三百斤



秦尧与冷热敷产品

的样品塞进几个大纸箱，硬着头皮推上了火车。硬座车厢放不下，只好咬牙补了张卧铺票。那一晚，纸箱占满了铺位，我硌在箱子边上，躺不下也坐不直，汗不停地流，把样品袋都洒得发潮。就这么熬了17个小时，到了广州。

站在熙熙攘攘的广交会场馆外，我们像打了鸡血，见到路过的人就拉住介绍产品。正是这场近乎“死磕”的坚持，让命运的门缝透进了一丝光。

3月，我们研发的行业首款高分子水凝胶蓄热材料，成功叩开了一家美国品牌商的大门。9月，改进后的产品迅速得到市场认可。到了2009年，我们接到全球最大连锁药店之一的订单。那张薄薄的订单像雪片，却温暖了我们整个冬天。

扎根黄陂同频共振

企业的成长就像种树，每一天都在扎根，每一步都算数。创业初期我们主要做OEM代工，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价格被压得很低，利润薄如刀片，企业差点又跌回谷底。那段被逼到墙角的经历让我清醒，没

有自主研发，企业就像浮萍，永远只能随波逐流。我们必须转向ODM，用专利和技术为自己筑起护城河。这一步棋，让柏凯真正站稳了脚跟，也为我们打开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另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关于管理。2013年前后，客户需求越来越多样、精细，生产和管理开始跟不上。当同行还在依赖手工记账时，我隐约感觉到数字化是未来的方向。于是，我白天处理日常业务，晚上就抱着编程书自己啃。这个习惯坚持了十几年，我和团队一起，从解决一个具体的生产排期小问题开始，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开发出了一套覆盖从客户需求、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制造到销售服务全流程的智能管理系统。

数据链打通后，奇迹发生了：定制化订单的响应速度大大加快，任何一个产品的生产记录都能快速追溯。这套系统成了我们在国际市场上重要的竞争力。

我们坚持每年将超过营收6%的资金投入研发，拥有了16项国内专利、10项国外专利。坚持把产品开发做到极致，针对身体不同部位开发了二三十种冷热敷产品，成为行业内产品线最全的企业之一，产品卖到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叫得出名字的国家。我常常指着办公室墙上的世界地图对同事们说：我们这张网，铺得越来越开了。

2010年，我们把公司搬到黄陂区横店街，柏凯在这里扎下了根，我也把黄陂当成第二故乡。这是我们成长的沃土，政府的跟进服务也为我们扫清了诸多障碍。从2015年迁入8000平方米新厂，到2019年墨西哥工厂投产实现北美72小时极速交付，再到

2024年二期24亩园区建成，我们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这里的支持。

因此我们在招工时，一直优先吸纳黄陂本地劳动力，特别是困难群体。厂里工人很多之前是家庭主妇，来我们这经过培训后，成了流水线上的熟练工，每个月有四千多块的稳定收入，还能照顾家庭。给大家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让员工的日子有奔头，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最实在的回馈。

2017年，我们还成立了柏凯慈善基金，累计捐款50万元，力所能及地回馈社会。

把提案写在土地上

2021年，我多了一个光荣的身份：黄陂区政协委员。我开始尝试将企业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和思考，转化成更具公共性和大众化的建议。

履职和做产品研发很像，都需要扎到一线去，听见真实的声音。2022年，我在黄陂北部乡村调研时，和几位老乡蹲在田埂上聊天。他们告诉我，现在村里年轻人少，很多地荒着，想种点值钱的东西，又不懂技术，怕卖不出去。那种守着良田却无力增收的焦虑，我感同身受。

回来后，我提交了一份关于乡村振兴与农业产业调整的提案。提案不能飘在空中，得能落在土地上，让乡亲们觉得可用、可行。我建议，要充分利用北部地区的土壤气候特点，因地制宜推广特色经济作物，并且要配套从技术培训、政策补贴到物流销售的全链条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把闲置土地的信息整理出来，向社会公开，吸引有想法、有能力的经营者来盘活这些资源。

另一个我投入很多精力的领域，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作为亲历者，我深知企

业转型过程中的迷茫与阵痛。在2024年的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我提出《关于加快黄陂区中小企业数字信息化的建议》。

想动员企业家积极转型，讲一百遍道理不如让他们亲眼见一次实效。所以我建议由政府“搭台”，定期组织中小企业主走进区内转型成功的“数字工厂”进行沉浸式交流，用真实的效益提升案例来点燃大家转型的信心。同时，政府也要当好“红娘”，通过场地、税收、人才公寓等政策，培育和引进一批本地化的软件服务商，形成一个小数字生态。只有产业链配套跟上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才能如虎添翼。

这些提案和建议，都源于我在经营企业时切身的观察和体会。企业管理中积累的经验，让我更清楚政策在落地时可能会卡在哪儿，资源应该如何对接才更有效率。比如，我们厂里推行垃圾分类时，发现现有垃圾桶不便分类也不方便回收人员整理。我和团队就自己动手设计改良了一款，先在厂里用起来，效果不错。这种从实践中来的“小智慧”，往往就是解决社会“大问题”的起点。

未来，柏凯会继续加大创新投入，向电子家居护理等新领域拓展。而我，也将继续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之策。我深信，“黄陂造”这条路，必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明亮。在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我们每个人的梦想，都将与黄陂的明天共同绽放。

为历史筑馆，让光影成像

◇ 赵汝波（口述） 甘 灿（整理）

人物名片：赵汝波，湖北省山东商会副会长，云图智像（湖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鑫永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汉澜鼎信（海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齐鲁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武汉市荷泽返乡创业服务站副站长。

我是山东人，从小在齐鲁文化的滋养下长大，那种“自强不息”“厚德仁民”的精神深深影响着我。工作后走南闯北做项目，在浙江体验过浙商精神，在上海感受过海派文化，最后在武汉安了家。这里“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江湖气魄也激励着我。这些年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做企业，特别是做文化和科技类的企业，背后必须有点精神撑着，要把根扎在深厚的文化土壤里，再用翅膀去借科技的风。

生活的磨砺中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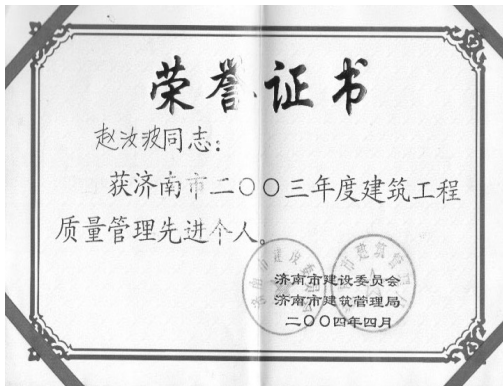
1976年，我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1岁时父母远赴河南谋生，我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早早就压在了肩膀上。这些磨砺塑造了我坚韧的性格，只要是认准的事，再苦再难也一定要做成。

18岁那年我考入了哈尔滨建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是建筑学专业。从曹县到哈尔滨，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我的视野也被彻底打开了。大二的时候家里遭遇了一些变故，我的学费和生活费没了着落，迫不得已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创业”。冰城哈尔滨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很常见，当同学们都待在温暖的宿舍时，我

蹬着一辆旧货市场上淘来的自行车，吱呀吱呀穿行在大街小巷，后座捆着两大箱“稀罕货”，箭牌口香糖和吉百利巧克力。

那个年代，这些洋品牌刚刚敲开中国的大门，有一定的市场潜力。我逐个拜访街边的小卖部和刚刚兴起的超市，在冰天雪地中穿行了三个月，我的“老伙计”链条蹬断了三次，脚上的棉鞋也是湿了又干，终于在中央大街一家连锁超市拿到了第一笔订单。手中紧紧握着这来之不易的“第一桶金”，我感受到的不仅是金钱带来的喜悦，更是一种模糊却强烈的念头：市场就在挨门逐户尝试的坚持里，在解决别人哪怕微小需求的过程中。后来我又在校园里“折腾”了几次，虽然没赚到多少钱，但却积累了宝贵的商业经验，更悄然埋下了一颗创业的种子。

大学毕业之后，我凭借专业知识进入了建筑装饰行业，从最基础的资料员、预算员做起，慢慢做到项目经理。经过不断努力，我负责的项目开始获得“鲁班奖”、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等一些行业顶级荣誉。到2005年，我已是国家一级建造师、高级工程师，还获得了省级先进个人等称号，在传统的装饰工程领域，算是站稳了脚跟。但是我总觉得日子太平淡了，有一种不满足感，好像少了点什么。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先进个人



优秀项目经理证书

在历史与展厅之间架桥

2006年，我开始了创业之路。在承接山东莒县博物馆的布展项目时，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中国美术学院徐征野教授。徐教授是国内博物馆展陈设计的奠基人之一，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博物馆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将文物陈列起来，而是架起一座穿越历史的“桥梁”，让观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历史。在徐教授的指导下，我们不仅顺利完成了莒县博物馆项目，更开启了我与文博事业近二十年的缘分。

后来我把重心从重复性较强的普通装饰工程，转向了博物馆、纪念馆、规划馆等专业性领域。经过多年积累，公司组建起了一支融合历史研究、空间设计、艺术创作和专业施工的成熟团队。我们做的是“展览陈列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从项目前期的历史研究、文案策划，到展厅设计、艺术创作，再到最后的工程落地，提供全链条服务，项目遍布全国各地。

最开始跟武汉结缘也是因为文博。2013年我们承接了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展厅改造工程，那是为了迎接一次重要的参观活动，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为了完成目标，

公司集中了最精锐的力量，在有限时间内，对整个展厅的展柜、灯光、氛围进行了全面的提升改造。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效果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肯定。我越

来越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历史“编剧”，要将厚重的历史转化为观众可感、可触的空间体验。这种成就感是之前做普通装饰工程无法比拟的。

此后，武汉市博物馆的整体提升改造以及省内诸多文博项目，都陆续交到我们手中。在频繁往来武汉的过程中，我越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与众不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造就了武汉人的“江湖气”，这里既蕴藏着“货到汉口活”的商业底蕴，又焕发着“敢为人先”的进取活力。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爱人，一位地道的武汉姑娘。在爱情与事业双重因素的吸引下，我开始将人生的重心向这座城市倾斜。

在文博领域深耕的过程中，有个问题一直让我觉得有些遗憾。无论我们如何精心地设计展厅、追求极致的体验感，观众与文物之间始终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互动只是简单体现为角落里的一块触摸屏，这依然是一种“隔空”的、疏离的对话。在王渔洋纪念馆，我们设想的“虚拟官服”体验，因为技术限制效果不佳；在泰安干部学院，我们希望实现的“空中飞屏”互动，也没能达到理想的状态。我渴望穿透那层“玻璃”，让历史能够变得“触手可及”，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这个执念，成了我第二次创业的起点。

“空中成像”照进现实

为了突破“打破玻璃”的技术难题，我开始频繁地参加科技展会，了解最前沿的技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上海认识了“像航(上海)科技”公司的张兵博士，张教授正在研发一种叫“无介质全息成像”的技术。当我



赵汝波现场演示无介质全息成像技术

走进他们的实验室，被眼前的一幕景象彻底震撼了。

那只是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平板，在其上方的空气中，一个色彩饱满、边界清晰的图像，稳稳地悬浮着，跟普通屏幕上的显示效果几乎没有差别。工作人员伸出手指，在图像前轻轻滑动，画面随之流畅切换，没有延迟，就像在操作一个平板，只不过这个“平板”是“空气”做的。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多年来的难题终于找到了破解的希望。

创始人向我解释原理：他们的核心是一种新型光学材料——表面密布着微米级光学结构阵列的负折射平板透镜，它可将发散的光线重新梳理、汇聚，在特定位置形成肉眼可见的影像，而操作则是通过红外传感器来实现。光影的呈现不再受载体的限制，交互也可以在空气中进行。在详细了解后，我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决定投资并深度参与这项事业。

我担任像航(上海)科技的授权代理与华中地区负责人，任务是把上海那台精密的“光机器”模组，结合湖北乃至全国千行百业的具体需求，量体裁衣，做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参加山东商会授牌仪式（右二赵汝波）

但是任何事业的初创阶段，往往都伴随着一段艰难的跋涉，科技行业也不例外。刚开始进行推广时，客户第一反应往往是“看起来很酷，但是用在哪里？成本要多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研，我们最终决定选择一个最微小、最普遍的点进行精准切入——电梯按钮。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公共场所的接触式交叉感染成为大家普遍担心的问题。我们的“无接触电梯交互终端”迎来了爆发式需求。不需要接触传统的按钮，手指在空气中轻点几下就能完成楼层选择、开关门的操作。这个应用看似简单，但直击要害，更加安全卫生。一时间，从医院、写字楼到住宅小区，我们的电梯模块迅速铺开。这小小的成功，为我们打开了市场的第一扇门。

但真正的价值，必须扎根于更深刻的行业变革。我们很快找到了第二个新的增长点，智慧医疗。在一些医疗机构中，我们的技术被应用于手术室，协助医生在手术中迅速了解病灶并做出精准判断，减少沟通成本，提高手术效率。主刀医生的视线和手都不用离开手术区域，所有三维数据悬浮在眼前，随手调用。而且从导诊、挂号、缴费到

查询，实现了无接触操作全场景覆盖，规避了很多潜在的风险。这一应用的巨大价值让团队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更加充满了干劲。

在文博领域，这项技术也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遗憾。我们在新的展馆项目中布置了空中文物互动台，观众不用再趴到玻璃上费力地寻找角度，只需伸手在空气中就能将青铜鼎随意地放大、旋

转，观察细微的纹饰，互动性大大增强。长期以来存在的“隔阂”被打破了，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我的文博事业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其他领域的推广应用也随之而来，从智慧家居、智慧社区到智慧银行、智慧政务遍地开花。我们团队的规模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现在正在积极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资质，并计划将更多的生产和研发向武汉转移。我想我带来的这项技术，或许不那么起眼，但它发出的光，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交互方式，让医院更安全，让博物馆更有趣，让家更温馨，让社区更便捷……

回顾这些年的创业历程，我从一个肩负生活重担的农村少年，到历史的“编剧”，再到追逐光影的科技创业者，有跨越更有坚守。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源于心中那个“解决遗憾，创造更好”的朴素愿望。武汉为我每一阶段的梦想提供了实践的舞台，也让我找到了一种将个人价值融入城市乃至时代发展的可能。

从珞珈学子到党报总编：朱九思的两篇早期佚文

◇ 李卫国

朱九思（1916—2015）从解放初起担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院长和党委书记，素有“华工之父”的美誉，30多年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高校，其卓越贡献自不待言。学界对朱九思的关注，多集中于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与高等教育思想方面，对其求学和革命生涯的叙述也多为概括性描述，缺乏最原始文献的支撑，整体较为宏观。由于朱九思在学生时代与革命时期所发表的作品存世较少，能够反映他个人情感与思想轨迹的文字，显得尤为珍贵。

笔者在翻看旧刊物时，偶然发现朱九思早期的两篇佚文，分别是《从西湖到东湖（废邮存底）》（1937年4月《江苏学友会年刊》）、《向谢文耀同志学习》（1948年6月17日《群众日报》），跨越抗战前后，长达11年。

《从西湖到东湖》

朱九思1936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当年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五年度》，便有他的注册信息：“朱九思，文学院哲学教育系一年级，年龄21，籍贯江苏江都，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毕业。”不过，他在第二年转入外语系。

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正在读大二的朱九思按捺不住热血奔涌，毅然投身抗日救亡浪潮，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

《从西湖到东湖》一文，发表于《江苏学友会年刊》，署名朱九思，而《江苏学友会年刊》正是由武汉大学江苏学友会编辑出



1936年，朱九思武汉大学入学登记照

版。江苏校友会“产生在民国十八年秋季”，其《本会会章》中提到“（一）本会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江苏学友会，（二）本会以敦睦友谊砥砺学行为宗旨”。学友会的成员不仅有学生还有老师，如文学学院院长陈源、外文系主任方重、法学院教授朱祖晦、工学院教授沈三多等，都是特别会员。其中，朱祖晦还为该刊题词：“敦品，励学，慎思，阙矜，主敬，咬得菜根，挑起重担，放开眼孔，立定脚跟，愿与诸子共勉之。”会员吴维清教授逝世后，学友会还组织成员献挽联花圈、慰问家属，并在举行第二次大会时默哀三分钟。

江苏学友会设有完整的干事体系，包括常务、文书、编辑、交际、会计、庶务、游艺等，其架构类似于现在的大学社团。学友会定期展开一些活动，初期比较简单，仅以茶话会为主，后来逐渐丰富，如《本届干事会的工作报告》提到的“组织足球队、篮球队、网球队、乒乓队、游泳队和戏剧团”。1936年开始编年刊，发表会员作品，标志着其活动层次和学术内涵进一步提升。除了朱九思，还有其他同学在年刊发表作品，如

何姗的《我的故乡：常州》，何东的《略谈扬州》，铁民的《镇江》，作平的《常州天宁丛林谈》，卜丁的现代诗《东湖怒了》《英雄》，梦电的诗词《秋思》《中秋月》，我明的《陈西滢教授》《芦浪教授》等。

朱九思入学不久便加入江苏学友会，这篇《从西湖到东湖》正是他写给高中老同学的一封信。信中所谈诸事，均与朱九思的生平经历高度吻合，是其所作无疑。原文共700多字，谨录如下：

是十个月之前，读完了高中，通过了会考的筛子，然后竟被升学与就业这两个家伙纠缠的一塌糊涂，终于像做梦似地被搬到西子湖滨，讨着一只饭碗，坚硬起心肠，独个儿第一次在异乡度夏天。算着日子——同班毕业的朋友们出征了。应试了。后来又眼巴巴地寻看各大学录取新生的广告，那时你也是一位吃到“粥”的“和尚”，真幸运得可以！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你竟抛弃了“新鲜人”的地位，也到杭州来就业。为什么呢？据说连你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原文如此，疑为“莫名其妙地”错排）。朋友们都为你惋惜。不过我似乎还得谢谢你，因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多得了一位亲切的伙伴。

我们惯常在一块儿谈天，在一道儿闲游；趁个空儿，总得出去溜达溜达，领受西子地风光，如此这般，打发了过去的一年。从西湖到东湖，虽然我们得暂时地分别，然而我敢发誓我底记忆里会永留着那些“有闲”的印痕，即虽做梦时，也得给他们优先的权利。

几次在湖泊里荡漾；小瀛洲的荷花开，又残了。

我们曾留恋于蜿蜒的九溪十八涧，倾听那潺潺的流水。我们以为这现象倒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具体而微，跟续的端（应

为“湍”）流，无情地抛弃了已有的存在。

我们曾脱去鞋袜，体验过它的清凉。

朋友！还能记起吗？——那次白龙潭的巡体（似为巡游体验之意），山颠（应为“巔”），底隙口挂下一条柱形的瀑布，也好像一像光明。把身子浸在水里往上攀爬，实在是一段艰辛的经程。

还能记起吗？——废历八月十八日在钱塘江畔观潮的一幕：先是远远的一条线，然后一堵墙，接着似一排野炮的怒吼，一群猛兽的突围，近了，那无限汹涌的势头，令人心悸，也令人振奋。可是今年的这一天，恕我可没法奉陪了。

从西湖到东湖，又过着学生生活的滋味。对于你底还打算升学的烦闷，现在我似乎没甚话说。总之，你得善自处理，不可性急。在目前我国教育制度下的大学，实在并不值得十二分的羡慕。所谓教育问题和其他妇女问题经济问题等一样，都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环，谅你也知道这些因果关系，无须我来唠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朱九思 1935 年 6 月高中毕业，因父亲认为读大学花费大，家里经济情况吃紧，让他先别考。于是他通过亲戚帮助，到浙江大学物理系附属仪器工厂做了一名小职员，月薪 20 元。1936 年春，哥哥来信，鼓励他继续备考大学，并表示会说服父亲。至 6 月学期结束，朱九思便辞职离开浙大，一举考上了武汉大学。文中提到“十个月前读完了高中”只是大略，来到西子湖滨即是到浙大工作，浙大正靠近西湖。

朱九思在文中谈到高中毕业面临人生选择，被升学和就业纠缠得一塌糊涂，反映了青年人的迷茫心态，既有未能继续升入大学的深切遗憾，也有对获得一份稳定的工



1947 年，朱九思在《群众日报》时与妻子王静合影

作、解决了生计问题的自我安慰。在杭州，朱九思与一位昔日同窗重逢，这位同窗被大学录取后竟放弃就读，也来到杭州工作，二人时常结伴同游，徜徉于湖山之间，共同度过了一段闲适惬意的时光。但朱九思稍后考上了武汉大学，两人自此分别。据信中所述，这位友人在朱九思离去后屡次致函，倾诉别后孤寂，并表示得知朱九思考入名校后，他又准备再度报考大学。对朋友的烦闷，朱九思在回信中予以宽慰，劝朋友沉下心来不可操之过急。题目中的西湖指的是杭州西湖，东湖则是指武汉大学所在的东湖之畔。朱九思以清畅婉转的笔触，细腻地回忆了和好友一年来相处的美好时光，文风清丽，情致深长，从中亦可见其不俗的文学素养。

1937 年 12 月 12 日傍晚，朱九思趁同学去食堂吃饭，铺盖一卷悄然离校。当时武大学生宿舍一间房住两人，“和他同房间的是进步同学林守正，但他却什么也不说”。

12 月 20 日到达延安，朱九思自此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上述这般悠闲惬意的记录甚少，此文就更显可贵。与他高大坚定的革命者形象和深邃睿智大学校长形象形成鲜

明对比，展露出一帧更为个体化的可爱青年身影。

《向谢文耀同志学习》

《向谢文耀同志学习》发表于《群众日报》，署名朱九思，是其本人无疑，因为他此时担任《群众日报》总编辑一职。1946年6月，朱九思离开部队，跟李锐一道从事新闻工作，担任《冀热辽日报》副总编辑……1948年初，朱九思接任总编。《冀热辽日报》后改为《群众日报》。

这篇文章回顾了谢文耀从事新闻与宣传工作的往事，其中提到“一九三七年底，尤其是武汉失守以后，数年未获音讯……十年多的校友而今竟成永别！”言辞中充满痛惜。

朱九思与谢文耀是武汉大学校友，在大学期间就已相识交往。“1936年秋季开学后，武汉大学学生谢文耀、郭佩珊、魏泽同、李锐……成立‘武大青年救国团’。参加这个社团的有三四十人……10月，正在哲学教育系读一年级的朱九思加入武大青年救国团。他后来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谢文耀在武大读书时也喜爱文艺，曾在《珞珈月刊》发表诗作如《沉默》《黄昏》《落叶》等，充满着对春天和光明的向往，“向午的光是褪落了 / 黑暗就要从风声中袭来……生命的光辉一闪就完了”“怀春的人踏着落叶 / 向落英葬处走去”。

谢文耀曾任新华社鄂豫皖野战分社副社长，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随军采访，《群众日报》1947年9月25日刊载有他的特别军事报道《刘邓大军挺进江淮间蛟龙入海纵横自如 蒋匪部属紊乱窘态百出》。1948年



1949年，朱九思三口之家

2月15日，谢文耀在汝正县李楼开展土改工作时，被匪徒包围杀害，年仅34岁，

朱九思的《向谢文耀同志学习》，反复阅读了谢文耀的新闻报道遗作，并总结其中所体现的三个突出优点，以示悼念之情。由于篇幅较长，全文不再辑录。

目前尚不清楚朱九思是否有其它笔名，他以本名在《群众日报》发表的作品很少，这可能与担任领导职务有关。

朱九思的两篇佚文，正好两种风格。一篇偏重日常生活的同学情，一篇痛惜革命道路上并肩作战的战友牺牲；一篇是轻松活泼的书信体，重在个人情思的抒发；一篇则是庄重深沉的悼文，从集体视角彰显前赴后继的革命激情。两相对比，也可看出朱九思从青年学子时期的迷茫探索，到确立信仰投身革命的一段心路轨迹。文中展现的细节，能够带领我们重返第一历史现场，体悟他从学生到战士的精神转变过程，从而对其形象形成更加丰满立体的认知。

李卫国，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大江流日夜 笔墨写春秋

◇ 施江城（口述） 银 华（整理）

我常想，一个人的命运，或许早在他的名字里就写定了。我生在黄浦江畔，长在长江之滨，而今八十春秋过去，我的生命始终与长江水相依。这一生的轨迹，就像江水奔流，千回百转，终究离不开这条大江。

名为江城，长于江城

我家祖籍江苏武进，1946年我在上海出生，4岁那年随父母来武汉。说来也巧，我的名字“江城”，仿佛冥冥之中就注定了要与江水相伴一生。

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让我练习书法，她常说：“放学回家就写字画画，不要



施江城

在外面惹祸。”因此，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先写完大字才能出去玩。

在解放路小学读三年级时，我被推荐到中南美专的少儿辅导班学习，起初学的是钢琴。那时冬天很冷，保暖条件也不好，手生了冻疮肿得厉害，影响了弹奏。老师看我这个情况，建议我不如换个班，试试学点别的。就这样，我从钢琴班转到美术班，拿起了画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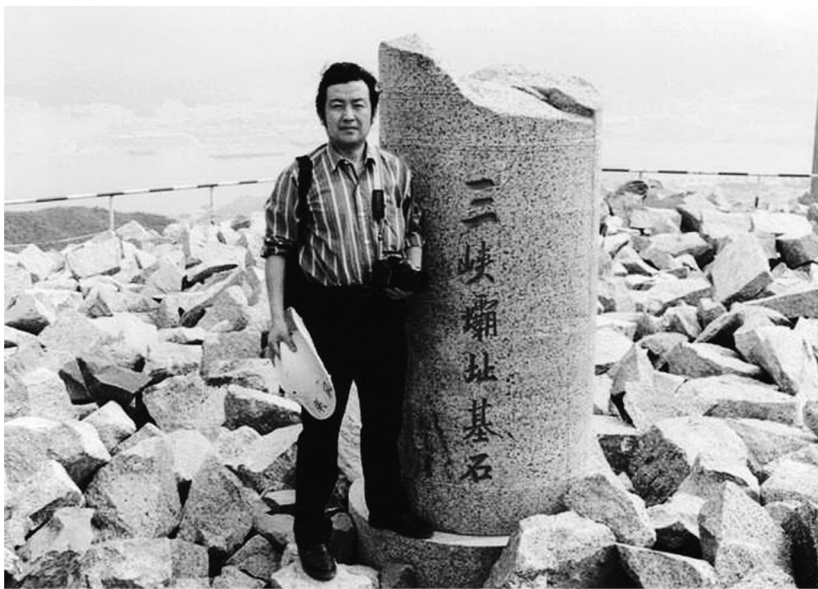
后来在武汉四十五中上初中，学校靠近人民电影院，那些精美的电影海报深深吸引了我，常常一站就是大半天，仔细揣摩那些画面。电影院的美工看我喜欢画画，让我帮忙打下手，我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绘画技巧，对我后来的艺术道路影响很深。

我深知，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命运，学习非常主动刻苦。我们兄弟三人的学费都是自己挣，平时放学后就去帮人拉板车，空车五分钱，重载一毛钱。暑假去大堤口挑砖，一天能挣一块多钱。虽然辛苦，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历反而锻炼了我的意志。

1964年，我考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习船机工程。在同学眼中，我是个“学霸”，数理化成绩都很出色，但我心里始终放不下对绘画的热爱，常常在课本的空白处画速写。

行走长江，纵笔长江

197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重庆港务局，在码头做装卸工。当时大学生要先



1996年5月，施江城在三峡大坝坝址基石前

到艰苦岗位锻炼，每天扛着百斤重的麻袋，在码头和货船之间来回奔波，汗水常常糊住眼睛。这份工作虽然辛苦，却让我真正走进了长江边普通工人的生活。因为擅长画画，我时常被调到港务局美术组，写写画画。

重庆三年，是我艺术生涯的重要起点，创作了一批以码头和工人为题材的油画与版画。这些作品在重庆发表后反响很好，获得不错的评价。这让我备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我用画笔记录长江、表现生活的决心。

1974年我调回武汉，在长江航务局总工会从事美术宣传工作。这对我而言，是人生的一個关键转折。一位老领导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喜欢画画，长江就是你终身的创作基地。”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从那时起，我算是正式走上专业艺术道路，那年我28岁。

长航是中央企业，外出交通便利，给了我一个沿着长江上下求索的舞台。改革开放之初，文化界迎来了春天。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也成了连接全国文化艺术界的纽带。许多沉静多年的名家大家，都渴望出来走走，

采风写生。长江上的轮船，成了他们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因为工作关系，我接待、陪同了无数来自天南地北的画家，油画、国画、版画、雕塑……各个门类的一流高手都有接触。那段日子，我就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学习请教。

与这些名家大家的交往，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立足长江进行创作的决心。我深刻意识到，要真正理解长江，就必须走遍它的每一个角落。为此，我进行了一次万里长江写生旅行，奔赴长江源头考察。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凭着长航的工作证，搭乘运输队的便车，借宿沿途兵站的简易宿舍，独身一人向西行进。

记得在沱沱河畔，面对广袤的冰川和奔腾的江源，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那个夜晚，我裹着军大衣坐在冰川下，月光映照在冰面上泛着幽蓝的光，四周万籁俱寂，只有冰裂之声偶尔传来，仿佛是大地在深沉呼吸。我颤抖着手在速写本上记录，铅笔的沙沙声，仿佛是我在与这片古老土地和源头之水进行一场对话。

在那极致空旷与寂静的环境中，深刻体会到自然之伟力与生命之渺小，也更加坚定了要用画笔为母亲河立传的决心。为了捕捉不同地段的神韵，我常常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好几天，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喝山泉水，沉醉于与山川河流的精神往来之中。这段经历，为我日后创作《长江万里图》积累了最原始也最珍贵的第一手素材。

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我逐渐形成对长江文化的独特理解：长江文化精神是开放的、坦荡的、豪放的，它象征着包容、进取和浪漫的民族精神。这种认识，深深地影响了我的艺术创作。正如我在后来的创作笔记中写道：“长江是一种雄健畅达、清韵而激

越的美，是一种浪漫飞扬、精妙而瑰丽的美，是一种陆离多彩、灵动而缥缈的神秘。”

三峡史诗，大江长卷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我认为艺术家既要扎根传统，又要面向生活。我很幸运，在艺术道路上遇到很多良师益友。1980年代初，经宋文治先生引荐，我结识了陆俨少先生。陆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曾乘竹筏深入三峡考察写生，在激流中体验三峡雄奇。他鼓励我要深入生活寻找灵感和素材，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

1991年，我带着十余米长的《长江三峡画卷》拜访何海霞先生。何老观后连呼“壮哉”，并亲笔为作品题名。他说：“我的老师画《长江万里图》主要是靠传统功夫、靠记忆，而你是靠生活基础、靠写生，不一样。将来你在这个基础上画出自己的面貌，那就厉害了。”这番话给了我极大鼓舞。

1996年，我完成了23米长的《长江三峡图卷》，得到张仃先生的题名。亚明先生更是给予高度评价，他在长跋中写道“气势博大，生气盎然，壮观又笔精墨妙”，称其为“近代不能多见之上乘佳作”。这些前辈的肯定，让我更加坚定了走自己的艺术道路的决心。

2006年，我历时20余年创作的《长江万里图》终于问世。这幅长卷全长60.55米，从长江源头一直画到入海口。我特别注意表现长江不同河段的特色，整个画卷分为十个乐章——大江之源、金川蜀水、山城明珠、夔门雄风、巫山云雨、西陵激流、高峡平湖、极目楚天、金陵仙山、海阔天空。这是我数十年来行走长江、研究长江的总结之作，画里的每一笔，都是我的足迹；每一处景致，

都是我的记忆。

在技法上，我恪守传统笔墨底线，但又不受自然物象的限制，运用了多年钻研的皴、擦、点、染技法，行笔追求自由肆意，用墨讲究轻重有度，通过反复皴点，层层积染，以求达到用笔雄健洒脱、用色清新典雅的效果。

这幅长卷的一个特别意义在于，这是画史上第一次在写生的基础上完成的长江长卷，它记录了许多因修建三峡大坝而永远消失的历史名胜。我希望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也能成为一份历史的视觉档案。

2009年，我主笔合作的《高峡平湖图》入选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这是一项崇高的荣誉。这幅作品后来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在“复兴之路”展览中陈列，之后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

创作国家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压力与动力并存。这幅作品需要展现三峡大坝这一世纪工程建成后的新貌，即“高峡出平湖”的宏伟景象。在创作中，我既要描绘出三峡原有的雄奇险峻的神韵，又要准确表现大坝建

成后“高峡平湖”的新气象。我们运用了传统的笔墨语言，但致力于表达现代的主题，力求使自然与人文、精神与作品、文化深意与笔墨韵味高度统一和相应融合。

这幅画我们先后创作三遍，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吸收领导、专家的审阅意见，不断地深化、调整和再创作，以求完美。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让我深刻体会到为时代立传的责任感。此画最终也得到了高度认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联合制作的《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百集特别节目，用专集进行了推介。

纽约特展，传递共鸣

2014年，受联合国新闻署邀请，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长江颂—施江城中国画作品联合国特展”。这是向世界展示长江文化的一个窗口，看着各国观众驻足欣赏，我深深感受到艺术可以跨越国界，传递美的共鸣。长江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代表着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这种精神应



《高峡平湖图》，200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

该被更多人了解和传承。

如今我年已八旬，但仍坚持每天作画。回顾这一生，从上海到武汉，从重庆到武汉，最终又从北京回到武汉，艺术始终围绕着长江展开。有人问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说不是哪一幅画被收藏，不是哪一个展览引起轰动，而是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做了一件事：把长江装进了心里，再把心里的长江画给了世人。

如今，看到武汉正在打造知音文化旅游区，看到国家大力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深感欣慰。1983年，我受邀为上海美术出版社创作《高山流水》连环画。知音文化是武汉独有的、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它讲述的是伯牙与子期的故事，核心是心灵的共鸣与真诚的交往。在创作时，我深入思考知音文化的深层内涵。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三言两拍”里的一个故事，其价值在于它讲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交往就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交往。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人与人之间渴望真诚理解，这个题材显得尤为珍贵。我试图在画作中表达的，正是这种“渴望找知音”的普遍情感。我倾注毕生心血完成的《长江万里图》等作品，能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它们文化传承的作用，这是一个艺术家最大的幸福。

除了艺术创作，我也致力于美术事业的推广和发展，曾担任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首任馆长，参与创建湖北省中国画学会并担任会长。艺术家不仅要有个人成就，更要有推动艺术发展的责任感，因此我提出“开胸襟，续文脉，厚底蕴，写精神”的艺术主张，希



2014年7月1日，“长江颂—施江城中国画作品”联合国特展

望年轻一代艺术家能够打开胸襟和眼光，续写中华文化的文脉。

艺术之路，如江水奔流，永不停歇。我会继续画下去，直到拿不动画笔的那一天。因为这条江，就是我的生命，我的艺术，我的一切。正如我在一首诗中所写：“大江流日夜，笔墨写春秋。此生何所求，长江万里图。”

施江城，湖北美术学院专业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湖北省中国画学会创会会长，湖北省文史馆馆员，著名长江山水画家

韩桐庵与首任台湾兵备道擦肩而过

——武汉市档案馆藏清康熙甲寅年地契考释

◇ 甘超逊

清康熙十二年（1673），汉阳人韩桐庵致仕还乡。回顾仕途生涯，从没有进士功名的贡生，历经多年宦海浮沉，自署理知县、同知到知府，不禁感念祖德宗功。第二年春天，他特意买下一大块土地捐助给韩氏宗祠，作为宗族祭产。历经350余载风雨，一页薄薄的地契，在历史烟尘中辗转流离，最终完好地保存于武汉市档案馆，留下一段历史记忆。

特别是，地契中关于“台湾兵备道”的记载，使清政府动议设置管理台湾机构的时间提前至康熙十二年（1673），这应当是清

史、台湾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则重要历史文献。

韩桐庵为汉阳人

韩桐庵捐助土地的契约形成于康熙十三年（1674）农历二月十五日。契约内容如下：

立捐助祭产字人韩桐庵，情因本人身受祖宗余荫，得署江西瑞昌县篆，承乏北直永平府及福建汀州府同知。前沐圣主殊宠，擢升广西南宁府知府，旋蒙上恩，擢升台湾兵

备道。去岁，倦翮思还，解组归田。今念祖德宗功，无以为报，良用心疚，特请族人景仆等为证，将历年俸银蓄积，凭中价买坐落韩家岗南台湖荒地一大段，约二百石之谱，东至竺台寺、西至玉天咀、南至熟地、北至湖，四界明白，情愿一并出捐于韩复祖名下，作为永远祭产，庶百世之蒸尝罔替，而千秋之俎豆惟馨。自捐之后，听凭管业、开垦、耕种粮、过户、完纳，本人子孙均应仰斯意，绝不得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此捐字一纸，交付宗祠执年人辗转保管，永久存据。

计批红契一纸，当场缴出。

凭族人 韩之焜、韩之珩

韩士竹、韩士孟、韩士孔

韩士林、韩之玠、韩之珮

大清康熙甲寅年杏月十五日亲立

契文较为完整记录了韩桐庵的仕宦经历和捐助土地的缘由、土地方位等内容，尤其关于任职的记载，是考定韩桐庵身份的重要依据。此契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由“去岁，倦翮思还，解组归田”，可知韩桐庵于康熙十二年（1673）辞官还乡。在此之前，韩桐庵任瑞昌县署理知县、永平府同知、汀州府同知、南宁府知府等职。笔者依次查阅清《瑞昌县志》《永平府志》《汀州府志》《南宁府志》职官志，除江西瑞昌县由于是署理任职不见记载外，其他方志中均有相关内容。

康熙《永平府志》卷十四《职官·同知》载：“韩章，汉阳人，恩贡，元年任。梁泰来，寿州人，举人，四年任。”可知，韩章任北平府同知在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四年（1665）之间。同治《汀州府志》卷十八《职官·同知》载：“韩章，汉阳人，贡生，康熙六年任。王廷璧，祥符人，进士，康熙

六年任。”可知，康熙六年（1667），韩章任汀州府同知不足一年。宣统《南宁府志》卷二十八《职官志·文职二·知府》载：“韩章，湖广汉阳人，贡生，康熙八年任。金光声，江南江宁人，拔贡，康熙十二年任。”可知，韩章任南宁府知府时间在康熙八年（1669）至康熙十二年（1673）间。

此外，契文中提及土地的方位，“东至竺台寺，西至玉天咀，南至熟地，北至湖”。乾隆《汉阳县志》卷三十《方外·寺观附》记载：“竺台寺，在县北三十里，今废。”竺台寺原址在今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辖区内。韩桐庵致仕回乡捐助土地作为韩氏宗族祭产，所捐土地必然是在原籍故乡。由此，可知韩桐庵为汉阳县人无疑，这与《永平府志》《汀州府志》《南宁府志》所记载韩章之籍贯一致。成书于康熙八年的《汉阳府志》中，明确记载韩章当时的职务、字号及籍贯“广西南宁府知府，韩章。桐庵，汉阳人”，且他还是这一版《汉阳府志》的参订人之一。

至此，从相关地方志中所考证的韩章字号、籍贯、任职经历，皆与契文中韩桐庵一致，可以确定韩桐庵即是韩章。

值得注意的“台湾兵备道”

考订韩桐庵的身份后，笔者必须引出本文的关键问题：清代“台湾兵备道”这一机构设置的时间。台湾自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后，就被郑氏集团占据，作为与清政府对抗的根据地。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澎湖海战郑克塽战败，清政府才收复台湾，实现对台湾真正意义上的管辖。为便于梳理分析，笔者将有清一代台湾道的设置变迁情况整理列表如下：

名称	存续时间	特征
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	康熙二十三—六十一年 (1684-1722)	管辖台湾、厦门地区
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	康熙六十一年—雍正五年 (1722-1727)	去兵备衔
福建分巡台湾道	雍正五年—乾隆三十二年 (1727-1767)	管辖地缩小为台湾、澎湖, 乾隆十七年后兼理学政
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	乾隆三十二—五十三年 (1767-1788)	加兵备衔
按察使銜分巡台湾兵备道	乾隆五十三年—光绪十一年 (1788-1885)	加按察使衔, 正三品官, 可自行向皇帝奏事
台湾省台湾道	光绪十一—二十一年 (1885-1895)	为台湾巡抚辅弼

目前所知, 清代正式管理台湾的机构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的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 即在康熙收复台湾的次年所设, 而“台湾兵备道”这一机构, 更要晚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才出现。那么, 在这份地契中为什么会有康熙十二年(1673)韩桐庵“扎升台湾兵备道”的记载呢?

契文中关于韩桐庵任永平府同知、汀州府同知及南宁府知府的经历都真实可考, 将土地捐出作为韩氏宗族祭产, 有多名韩氏族人见证。于理于情, 韩桐庵没有必要在契文中伪造自己升任“台湾兵备道”一事。同时, “台湾兵备道”也不可能是“台湾厦门兵备道”的简写或“台厦兵备道”的误写, 因“台湾厦门兵备道”一职要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才设置, 韩桐庵不可能未卜先知, 提前11年就知晓这一官职。据此推测, 清

政府在康熙十二年(1673)就有设立“台湾兵备道”一职的动议, 且已擢升南宁知府韩桐庵担任。

考诸史实, 自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 并于次年收复台湾后, 清政府就开始与郑氏集团接触, 以期解决台湾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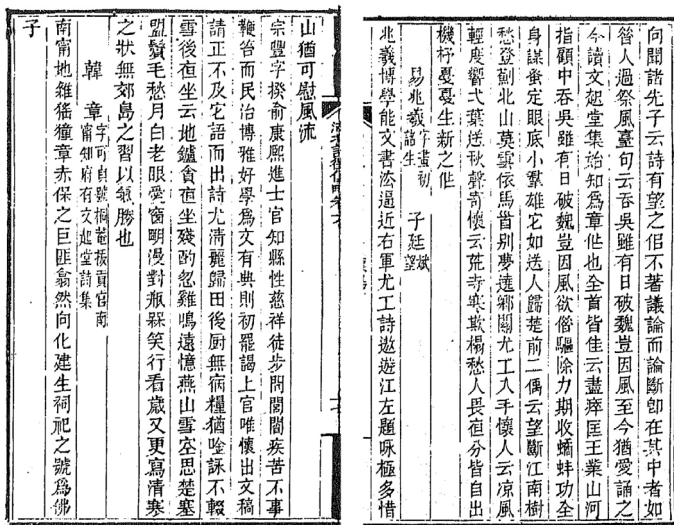
康熙元年(1662), 郑成功病亡, 其子郑经袭延平郡王位, 内部争权, 矛盾激化。清政府遣官至厦门招抚, 郑经决定“暂借招抚为由, 苟延岁月, 俟余整旅东平, 再作区处”, 于是派使者入京议和, 以不剃发、不易衣冠、不登岸, 只进贡为条件。清政府则坚持剃发、登岸等招抚条件, 郑经不从, 和议失败。同年, 清政府在“江、浙、闽、广各设满汉兵、户郎中一员, 专司招辑”, 以招降郑氏军民。

康熙二年(1663), 郑经由海门进攻澄海, 为清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所败。清军攻克金门、厦门, 郑经败退铜山。

康熙四年(1665), 清靖海将军施琅率水师进攻台湾, “遇飓风, 不克而归”。康熙六年(1667), 清政府派在京候补官孔元章入台湾招抚, 郑经以“台湾远在海外, 非中国版图, 先王在日, 亦只差‘薙发’二字”为复, 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 被清政府严词拒绝。同年, 孔元章再次衔命入台, 郑经依然不改就抚条件, 招抚再次失败。

康熙八年(1669), 康熙下诏, 派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入福建泉州主持对台湾郑氏的谈判, 遣兴化知府慕天颜携诏书入台招抚。郑经提出“不削发, 称臣纳贡, 尊事大之意, 则可矣”, 康熙不允, 谈判无法进行。

可见, 自郑氏集团占据台湾起, 无论招抚和议, 抑或武力收复, 清政府从未放弃谋



《湖北诗征传略》中关于韩桐庵的记载

划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清政府在康熙十二年（1673）有设置“台湾兵备道”的动议，也自在情理之中。

清初兵备道之设置沿袭明朝，主要职责是整饬兵备，稳定地方秩序。康熙十二年（1673），台湾尚在郑氏集团占据下，清政府设置“台湾兵备道”，其目的无疑是为武力收复台湾而作准备。而考察韩桐庵的任职经历，也具备在康熙十二年（1673）出任“台湾兵备道”的条件。韩桐庵从署理知县，到两任正五品的同知，到从四品的知府，再升任“台湾兵备道”，符合官员晋升的一般规律。又从《湖北诗征传略》中“南宁地杂猺獠，章赤保之，巨匪翕然向化，建生祠祀之，号为佛子”之记载，可知韩桐庵在南宁府知府任上平定匪患，保境安民，颇有政绩，深受百姓爱戴，擢升符合常理。且韩桐庵康熙六年（1667）曾任福建汀州府同知，对福建沿海一带地理、民情必定有所了解，清政府擢升其任“台湾兵备道”，应是综合考虑他的这一段任职经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

但康熙十二年（1673），韩桐庵致仕还乡，而清政府尽管动议设立“台湾兵备道”，

且已任命韩桐庵担任，最终却没有施行。这应该是目前所见其他文献史料没有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清政府设立“台湾兵备道”一事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何康熙十二年（1673）之后所修的《汉阳府志》《汉阳县志》中记载韩桐庵的最高官职仅为南宁府知府。

至于为何康熙十二年（1673）清政府动议设立“台湾兵备道”而未施行，笔者认为应该与这一年爆发的三藩之乱有关，清政府无暇顾及台湾问题，只得暂时搁置。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台湾厦门兵备道，将11年前的动议落实，但改原来的“台湾兵备道”为“台湾厦门兵备道”。

自出机杼的诗人

作为清初一名中级官员，笔者本以为关于韩桐庵的记载仅限于地方志，但在查阅《湖北诗征传略》《清诗汇》等文献时，发现韩桐庵还是清初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

《湖北诗征传略》的辑录者是晚清学者、孝感人丁宿章，著名学者俞樾在为《湖北诗征传略》所作的序中，称其为“楚北名宿”。该书汇集湖北古今诗家作品，并“先叙其生平，复论其品格”。关于韩桐庵，其中记载：

韩章，字可贞，号桐庵，拔贡，官南宁知府，有《文起堂诗集》。

南宁地杂猺獠，章赤保之，巨匪翕然向化，建生祠祀之，号为佛子。

向闻诸先子云：诗有望之似不著议论，而论断即在其中者，如昔人《过祭风台》，句云“吞吴虽有日，破魏岂因风”，至今犹

爱诵之。今读《文起堂集》，始知为章作也。全首皆佳，云“尽瘁匡王业，山河指顾中。吞吴虽有日，破魏岂因风。欲借驱除力，期收鹬蚌功。全身谋早定，眼底小群雄。”它如《送人归楚》前二偈云“望断江南树，愁登蓟北山。莫云依马首，别梦达乡关”，尤工；《入手怀人》云“凉风轻度响，一叶送秋声”，《寄怀》云“荒寺寒欺榻，愁人畏夜分”，皆自出机杼，戛戛生新之作。

由徐世昌及其门人于民国十八年（1929）汇辑而成的清诗总集《清诗汇》，收录6100余家诗人的27000余首诗作，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有清一代的诗歌面貌，一些流传不广的诗歌、声名不彰的诗人赖此传世。关于韩桐庵，其中亦有记载：“韩章，字可贞，号桐庵，汉阳人，拔贡，历官南宁知府，有《文起堂诗集》。《过祭风台》：“尽瘁匡王业，山河指顾中。吞吴虽有日，破魏岂因风。欲借驱除力，期收鹬蚌功。全身谋早定，眼底小群雄。”

二书均记载韩桐庵有《文起堂诗集》传世，且存其《过祭风台》一诗。丁宿章认为此诗“不著议论，而论断即在其中者”，许为“全首皆佳”。而读丁氏所列举的“望断江南树，愁登蓟北山。莫云依马首，别梦达乡关”“凉风轻度响，一叶送秋声”“荒寺寒欺榻，愁人畏夜分”数句，风格苍劲沉郁，许为“皆自出机杼，戛戛生新之作”，并非过誉之辞。可见，韩桐庵工诗，在湖北地区有一定的影响。

徐大纲所著《熊伯龙家世及行年考略》记载，韩桐庵还写有一首题为《送熊次侯典试浙闱复命》的七律：“二月莺花拥路香，水溶沙软马蹄忙。书搜宛委归中秘，笼贮参苓上玉堂。芳草离筵仙仗远，春云御苑客思长。遥期京国追随日，为听宣麻自帝傍。”

廣	浙	刑	兵	戶	吏	工	內	參	浙	陝	漢	漢	漢	漢	漢
西	江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訂	江	西	川	陽	陽	陽	陽
南	紹	廣	職	文	文	書	書	訂	承	慶	陽	陽	陽	陽	陽
寧	興	西	方	選	選	院	院	訂	嘉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府	府	司	司	司	司	侍	侍	訂	縣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知	知	主	主	主	主	讀	讀	訂	知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府	府	事	事	事	事	學	學	訂	縣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韓	張	易	先	先	先	吳	吳	訂	王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章	三	道	克	克	克	正	正	訂	世	本	允	允	允	允	允
人	要	清	誠	誠	誠	治	治	訂	顯	固	發	發	發	發	發
初	向	人	人	人	人	漢	漢	訂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老	木	人	人	人	人	漢	漢	訂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訂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訂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清康熙《汉阳府志》中关于韩桐庵的记载

熊次侯即熊伯龙（1617-1669），字次侯，湖北汉阳人。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榜眼，累任国子监祭酒、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博通经史，擅长诗文，是清初著名文学家。《清史稿》载：“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韩桐庵的这首诗是送别之作，可知他与同乡著名文人熊伯龙有所交游，而熊伯龙亦是康熙《汉阳府志》的参订人之一。

关于《文起堂诗集》，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载：“《文起堂诗集》十五卷，韩羹卿撰。羹卿生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原名之锦，号二桥，浙江临江人。”知韩羹卿与韩桐庵非一人，《文起堂诗集》当是二人同名诗集。至于韩桐庵之《文起堂诗集》，晚清时期的丁宿章曾寓目，则该诗集或尚存于世间，唯俟他日得见，一窥其诗歌面貌风格。

甘超逊，武汉市档案馆征集编研部干部

武汉兴起 30 万封抗战慰问信运动

◇ 汪梅梅

1938年7月7日至11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发起献金运动。5天内献金者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数超过百万元。

为了使百万元捐款能可靠的用来慰劳前方将士和赈济难民，在第三厅主持下，组织成立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委员会（简称慰劳总会），郭沫若任副会长，具体工作由第三厅的中共秘密党员负责。

8月11日，慰劳总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一则征求30万封慰问信的启事：“本会现正着手办30万个慰劳袋，组织慰劳团，分送给前线将士，同时预备在每个袋子里，都装上一封后方同胞的慰问信；一方面，表示后方民众对前线将士的关怀；一方面也可



《新华日报》刊登征求启事和社论



《新华日报》刊登《八路军代表叶剑英写信慰劳前线将士》

以借此鼓励鼓励士气。但三十万封信，不是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做到的……希望各界同胞，不分男女老小，团体个人，大家都来尽一点力，每人至少自动写一封至几十封。”

这一运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8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加紧三十万封慰劳信运动》，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不仅要踊跃参与这一运动，还要动员广大群众，鼓励和帮助他们写慰问信。为此，《新华日报》开辟“卅万封慰劳信运动”专栏，并随报附送慰劳前方将士信笺，设立代收点帮助群众转送慰问信。

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中共湖北省委的工作人员都积极带头写信。叶剑英在慰问信中写道：“不管你我之间，有着某种不同的信仰，可是我们大家的枪口，都向着一个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

在中共的大力号召和组织下，各界民众踊跃参与到写慰问信的活动，一场轰轰烈烈的30万封慰问信运动从武汉兴起。

青年救国团是慰问信运动的生力军，他们不仅赶写了大量慰问信，还夜以继日缝制慰劳袋，并在街头向民众募集，仅8天时间

就献出慰劳袋1200个。每个慰劳袋外面写着“抗战到底”“保卫武汉”等，里面除了装有草鞋、毛巾、肥皂、八卦丹、云南白药、书籍等实用物品外，还附有慰问信一封。

武汉各界民众，从学生、工人到摊贩、难民，从黄毛小儿到耄耋老人，从识字的到不识字的，全都加入到写慰问信的大军，纷纷为前方将士送上最真诚的感谢和鼓励。

亲爱的为我们在前线拼命的爸爸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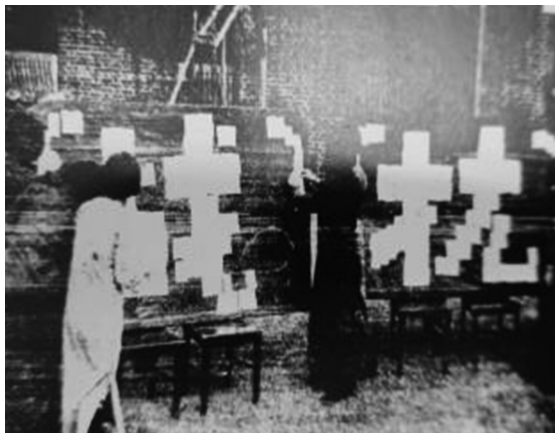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小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们才对，但我总爱听你们打鬼子的事。你们胜利了我非常高兴，如失利了我要为你们哭脸的。不是吗？……虽然我年纪小，杀鬼子的心却同你们一样的！可恨一点，我拿不动枪，如拿动枪，我早已来帮助爸爸们的忙了。等我罢，拿动枪我一定要打鬼子的。

爸爸们，鬼子欺侮得我们太可恶了。他杀了我们的同胞，他还占了我们的土地，你们好好的杀鬼子罢？鬼子杀完了回来，我一定向爸爸要钱给你们买甜甜食的。祝

你们胜利！

你们的小姪姪

曹馨生敬礼



武汉女子中学用慰问信组成“抗战”二字 / 青年救国团缝制慰劳袋

劳苦功高的将士：

我今年已六十八岁了，靠卖油条过活。家里也没有别人，就是一个人。我认得字，读过几年书。现在武汉一天天危险了，我知道你在前方很吃苦。我很敬重你们，希望努力和日本鬼子拼命，不要让鬼子到武汉来。我老年人别的不会做，不过我也有一张嘴，把你们勇敢打鬼子的事情，告诉大家，唤醒大家，叫大家帮助你们。完了。希望你们

百战百胜
一战成功

萧国钧敬上八月十六日

亲爱的战友：

我是一个受壮丁训练的老百姓，昨天早上我从操场回来，在江汉路碰到一个法国兵，他忽然举起手来向我敬礼，我奇怪地也给他一个答礼。回到店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杜先生。杜先生说：“外国兵，过去是很看不起中国兵，他们以为中国兵，只会打中国人，但是，这次中国兵打日本的英勇，给他们一种不同的感觉。因此，在中国的英美法军人，都非常看重中国兵，不仅是看重，他们有的还掏腰包来捐款劳军呢。”战友们，我们的英勇抗日，不特中国民众爱护，连外

国人也敬重我们，那么，我们应格外努力杀敌了！你们以为怎样呢？

你们的伙伴史光贡
八月十九日

30万封慰问信运动，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各地纷纷响应。到9月中旬，30万封慰问信准备就绪，慰劳总会组织了若干个慰问团，率领各机关、团体的代表和演剧队、放映队，携带着慰问信和慰劳品，赴前线劳军。

这一运动不仅极大地鼓舞和提高了前方将士的爱国热情和抗敌士气，而且动员起广泛的群众力量，军民团结一致保卫大武汉。

汪梅梅，武汉革命博物馆馆员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六）

◇ 刘宝森

航空救国与国民空军创立会

航空救国这一概念，早在清末便由中国近代航空先驱冯如提出：“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势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归国，敏锐预见到飞机对于军事作战、民用交通的重要作用，热切期望中国有自己的飞机。美国华侨及湖北、广州、上海军政府先后创办航空队。1915年，由孙中山亲自定名的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在日本西京八日市机场成立，学校有华侨学员20名，华侨捐赠飞机3架。1916年5月，该校迁至山东潍县，更名为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华侨义勇团飞机队，参加讨袁战争。

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及他对航空事业的期望，集中体现在1921年撰写的《十年国防计划》中，其63个要点涉及航空的多达9个：建设新的航空港、制定航空建设计划、举行全国空军攻防战术演习、向列强定制飞机以便进行仿制、聘请外国航空教练来华训练空军、空军建制标准化、发展航空制造业、训练一支立于不败之地的空军、研究列强远东地区空军力量与中国防空的关系。

1933年一·二八事变一周年纪念期间，航空救国运动开始付诸实施。《申报月刊》载：“（国人）痛定思痛，起而作航空救国运动，纷纷倡议募捐救国基金，扩充航空队，设立飞机场。但因为缺乏组织以作整个的计划，所以至今尚少成绩。至今年‘一·二八’周年纪念，国人追溯沪战失败的原因在于空军的缺乏。”



“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邮资片

为落实航空救国运动，民间利用各种媒体，设立“航空救国周”开展宣传。1933年1月30日，政府层面为统筹民间捐款购机计划，设立三项原则：各省按人口及经济状况摊派购置若干飞机的款项，所需现金按一定比例由当地群众、公务员分摊；组织捐款委员会以保管捐款；捐款时限为6个月，结束后由各省将款项统一送中央以购置飞机。

2月25日，湖北国民空军创立会在汉口成立，由湖北省政府主席夏斗寅、汉口市市长吴国桢、汉口市公安局局长陈希曾等7人担任常务理事，在武汉三镇及蕲春、浠水、潜江、樊城等地设立分会。湖北国民空军创立会要求全省城市居民按一定标准缴纳房屋捐以冲抵捐款，各机关、团体、商店、工厂、学校所有领受工资薪俸的个人均要捐款购置飞机。在湖北空军创立会的运作下，至5月15日募集款项达18600余元。

平汉铁路员工成立国民空军创立会平汉路分会，从2

月5日开始，江岸铁路员工1000人分成4队69组，在武汉三镇宣传航空救国，提倡民众自动组织国民空军，并决定自身节衣缩食捐献飞机一架。同时，通电全国各铁路，呼吁捐献飞机救国。

3月20日，平汉路分会宣传组在汉口创刊《国民空军》，不定期出版，至1933年8月1日第7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蔡泽、厘毫、柏华杰、代公、孟西、泉孙等。为扩大宣传范围和提高宣传效果，该刊遵循“除各大都市外，尤注重内地农村，各县镇机关团体学校或个人”的发行原则。

《国民空军》极力宣传空军的重要意义，对于提高国人的空防意识、普及航空知识、促进中国空军的建立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了解研究中日之间紧张的军事冲突及国际空军备竞赛的情况。

《国民空军》极力宣传空军的重要意义，对于提高国人的空防意识、普及航空知识、促进中国空军的建立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了解研究中日之间紧张的军事冲突及国际空军备竞赛的情况。

辛亥革命志士、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在抗



“湖北号”飞机

战时期，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要“抱大志”“做大事”，“民族抗战重任，直接间接将加于双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陈时支持下，中华大学学生组织许多爱国团体，尤其活跃的是1934年光未然创建的学生剧团秋声剧社，发展为武汉拓荒剧团，创作出独幕剧《阿银姑娘》，阎述诗谱曲的序曲《五月的鲜花》，一时唱响全国。这首歌热情讴歌抗日志士，鞭笞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投降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挥起拳头与日寇抗战到底。光未然在1939年又创作出著名的《黄河大合唱》。

在航空爱国运动中，陈时组织成立国民空军创立会武昌分会。1933年3月6日，出席中华大学总理纪念周，报告校务及国民空军创立会武昌分会的组织经过。陈时说：“募资购置飞机，充实国防，作直接救国工作”。“现在各强国的飞机数，是由二千到五千。武装和平，武装救国，是要拥有最高武力。愿国民继续努力，这是最好的机会，最有效的工作啊！”

由湖北各界民众捐赠的飞机命名为“湖北号”，由平汉铁路员工捐赠的两架飞机命名为“平路一号”“平路二号”。1934年3

月15日，三机同时举行命名典礼。

自1935年开始，日本在华北地区挑起一系列事变，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空前严重的程度。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寿辰，由中国航空协会牵头，自3月中旬至10月31日开展“献机祝寿”运动，各省市捐款达655万元，购置飞机57架。中华大学师生在校长陈时的表率作用下踊跃捐款，全体师生10月28日整队渡江，前往汉口王家墩机场参加献机命名典礼。

武汉防空展览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首次遭受外国空袭。次年，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飞机更是大规模狂轰滥炸，使人们意识到“无空防即无国防”的深刻含义。

1933年1月23日，在上海开风气之先的带动下，南京、杭州、南昌同时举行“航空救国运动宣传周”活动。2月8日，武汉商界在汉口商会召开航空救国筹备会，成立中国航空协会武汉分会，“决（议）征收房租半月，并通知各业筹款二十万，购备高射火炮，余作中央航空设备之用”。



武汉防空展览会开幕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5年6月6日，南京防空展览会在南京公共体育场开幕，计有航空器、防空兵器、炸弹、防空配备、防空监视、防空情报、防空通信、防空警报、消防、防毒、救护、交通管制、灯火管制、伪装及烟幕、防空建筑设备、防空宣传等16大类共757件，分别在南京第一公园、公共体育场、民众教育馆设置展览室。19日下午，举行闭幕典礼及飞行表演。

防空展览拟分4批到各地巡展，武汉、南昌、长沙、重庆、成都、宜昌列为第一批巡展城市。由于武汉正值伏汛，人心惶惶，各机关忙于抢险堵漏，展览被迫延宕至南昌、长沙之后。

“为留存永久纪念暨供各界之研究起见”，湖北省防空协会决定在汉口江汉路铁路边的刘园和黄孝河边建立两个防空地下室，聘请汉口市政府工程师设计。8月22日，开始拆迁棚户及排水挖土，随即兴工打桩连夜赶造，可惜未能赶上防空展览会开幕时竣工。9月3日起，武汉举行“防空宣传周”，敦请军事专家巡回讲演及广播无线电讲演，积极进行防空宣传，“以唤起全体市民之注意”。9月8日，武汉防空展览会在汉口

中山公园举行开幕典礼。9时整，中央航空第五队派出飞机5架，由王家墩机场起飞，高凌上空，绕场三匝，随即单机表演飞行技术，翱翔上下，精彩纷呈。随后复由512、515、519等3架飞机编队，或成一字，或成人字，或矫若游龙，或疾如鹰隼，旋复掷出各种彩色标语，映照朝曦之下，美丽灿烂如落英缤纷，观众莫不欢欣鼓舞。

航空展览分设在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和刘园，每天展出9个小时。9月7日的《武汉日报》用3个版的篇幅，发布武汉各机关团体及民众参观的时间安排，按日分5个时段分批次参观。

新市场前的中山马路扎起高三四丈、宽约九丈的城楼式牌楼。牌楼俨如壁垒，意蕴“防御”之意；髹漆绿色，则示“保护”之征。上有“御侮制空”“罔顾空防，等于灭亡”等标语。同时，在汉口各街道主要地点扎制牌楼，“俾引起民众深切之注意”。

新市场第一展厅是航空器材展览室，陈列各种飞机、飞船、汽艇、气球、发动机、飞机场、航空母舰等模型及图表，用以介绍航空发展史及效用。第二展厅是积极防空展览室，陈列各种高射炮、高射机关炮、

照测仪、指挥仪、高射炮阵地、各国飞机标识与数量比较等模型及图表。第三展厅是消极防空展览室，陈列监视、通讯、情报、警报等各种器材，以及灯火管制、烟幕伪装等模型及图表。第四展厅是化学兵器展，陈列各种化学兵器，以及消毒防毒等各项模型、图表。第五展厅为防空配备及防空建筑展览室，陈列都市防空配备模



新市场前的防空展览牌楼

型、地下室模型与消防、救护等器材及图表。新市场屋顶安装防空警报器，不时拉响“声震遐迩，市民胥为之注意”。

刘园竖立有两吨重的巨弹模型，比人高出一倍。场内搭有两个棚子，陈列各种实物防空兵器及爆炸弹模型。一棚内有冯庸 F 式飞机 1 架、装甲车 2 辆；一棚内有高射炮 2 门、高射机关炮 5 架、消防车 2 辆、防空炸弹、穿甲弹、照明弹及防毒面具等。

刘园为武汉警备司令部驻地，展期该部兵营全部开放，凡参观者准许参观兵营，兵营届时举行各种防空兵器演习。

防空展期间，每天上午 10 时，在上海、光明、世界 3 家电影院放映防空影片；在中山公园特辟露天电影场，每晚 8 时起放映防空影片；在武昌阅马场、徐家棚、公共体育场以及汉阳大校场设流动放映点，轮流放映防空影片。

“为便民众明了夜间空袭之利害起见”，9 月 11 日晚 8 时，张学良亲自驾驶自备福特飞机，在武汉上空进行夜间飞行表演，“并以各色电灯装置机身及两翼，示观众以飞行高度与方向”。旋即又凌空抛掷红白蓝三色信号弹 15 枚，以代替爆炸物及毒瓦斯投下，“时冰轮当空，观察明晰，其飞行之技术，或如燕掠鹤落，或如鹰攫隼击，机声轧轧，观众莫不欢声雷动”。半小时后，又掷下小照明弹一枚，“停留高空约数分钟，照耀有如皓月”。8 时 45 分，表演完毕。

9 月 18 日即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纪念日，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举行闭幕式，以唤起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中央航空第五队 501 号飞机凌空而起，绕场飞行一周后，散发《汉报》



印赠的防空小标语 20000 张。随后，3 架军用飞机遥遥莅止，在空中表演飞行技术后进行跳伞演习，飞行员从 3000 米高度跃下平安落地，武汉民众掌声雷动。

参考文献：

- [1] 严斌林：《1935 年武汉防空展览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
- [2] 钟星、宋晓丹：《抗战时期武汉首次防空展览会》，《档案记忆》2018 年第 4 期。
- [3] 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编：《防展特刊》，1935 年。

刘宝森，武汉公交集团退休干部

老武汉年俗童谣：忙年

◇ 彭翔华

春节，中华民族一年之中最重要、最具人文情怀和民俗情趣的节日，其历史之久、影响之大、欢庆指数之高、文化底蕴之深，是西方圣诞节、狂欢节无法比拟的。

老武汉过年三部曲，一是办年、忙年，二是吃年饭、守夜、拜年，三是玩年、闹年。整个过程仪式感强烈，内容丰富多彩，地域特色鲜明，充满着对生活的热切期待。

办年，忙年，不忙就不叫过年。人不分贫富，家无论大小，年前都是要忙的，从腊月中旬开始忙到除夕之夜。街里街坊的，这段时间见面的问候也有变化，平时是“你驾（敬词，相当于“您”）吃了有？”这时会问：“你驾的年办得么样？”

腊时腊月，诸事繁多，腌鱼肉、炸圆子，打块尘、揩房子，贴对联、买鞭炮，忙得不可开交。陈佩璋《武汉旧时的拜年谣》辑录

的童谣描述说：二十一，买支笔；二十二，写对子；二十三，做鱼余；二十四，又打扬尘又做事；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插红烛；二十七，事办毕；二十八，把鸡杀；二十九，样样有；三十到，不睡觉；初一早，年拜了。

二十二，写对子

对子就是对联，总把新桃换旧符，贴对联更新门面。旧时讲究多，有门联、堂联、房联、灶联，甚至鸡笼、猪圈、牛舍都要贴上吉祥语。还有一些贴纸、笺条。封门笺贴在大门缝上，上书“开门迎福，封门纳祥”等。挂在门楣上的叫门钱，又叫“挂钱纸、过门笺、门吊子”等，三五张，书有“迎春纳福、招财进宝”等。



《一年中的现象》

黎锦晖、吴启瑞、李实《中国廿省儿歌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23年版）第26页载有一首叙讲时令、节俗的童谣《一年中的现象》，第一句为：“正月是新年，家家挂门钱。”现在，贴门联依然红火，挂门钱则不多见。

二十三，做鱼汆

鱼汆，就是鱼圆子。汆，读cuān，上“入”，下“水”，合起来表示“把东西放入沸水”，是一种烹调方法。鱼汆色泽白净，鲜嫩滑润，口感极佳且营养丰富，是过年的必备之物。江汉大地，鱼米之乡，武汉人喜欢吃鱼，也会吃鱼，更会做鱼，“吃鱼不见鱼”是一大特色。除鱼汆外，还有鱼糕，鱼面，鱼糊等。

将鱼肉取出的过程，有个专用词叫“刮鱼肱”，肱读hóng，特指鱼肉。“刮”字很形象，实际上是边取肉边加工，使之成为泥状。做鱼汆有个关键动作，武汉人叫“括(kuá)”，即用手掌不停地搅动，使其松软。

鱼肉刮毕，剩下的鱼骨鱼刺叫鱼盔，把它剁成块子，裹上灰面(面粉)，放进油锅一炸，又香又脆，可以连骨带刺一起嚼。

腊肉一般在冬至后开始腌制，不用烟熏，在阳光下晾晒。腊肉别有风味，“红菜薹炒腊肉”是武汉极有特色的时令菜品。用腊肉、腊骨头煨(āo，文火慢炖)汤，味道醇香，汤酃肉鲜，“一家煨腊肉，百家香闻够”。腊肉汤上厚厚一层油，温度很高但不冒热气，容易让人误会。旧时笑话，新女婿在岳父家做客不知根底，猛然喝了一大口腊肉汤又浓又烫，不好意思当众吐出，结果烫得泡子流了的。人们笑道“腊肉汤，不出气，烔(tá，烫)死个荅女婿。”

腊鱼也叫烘鱼，一般整条腌制，而且不打鱼鳞。一说鱼鳞可入味，二说“整而不破”为吉。腊鱼蒸食非常香，其他作料不需，放点生姜就行了，也不用剁成块，直接用手撕着吃，才能品尝出本色本味。

在油水不足的日子里，开油锅是件大事，大人会反复嘱咐你们不可在油锅旁边穿来走去，甚至不能多嘴，犯忌的话就更不能说了。油炸食品很多，肉圆子、藕圆子、豆腐圆子、藕夹、豆腐泡、炸鱼、兰花豆、花生米等。还有些过年的零食，炸翻馓、炸猪耳朵、炸锅巴年糕等最为常见。把炸好的东西放进竹篮、竹篓吊起来，一来通风，二来防备猫子老鼠，当然也防你们偷嘴。你们也有办法，趁大人不注意，搭起板凳、踮起脚尖偷吃。

二十四，又打扬尘又做事

此处“扬尘”应为“块尘”。块，yáng，就是灰尘。《说文解字·卷十三·土部》：“块，尘埃也。从土央声，於亮切。”打块尘，

就是对居所来个彻底大扫除，这也是除旧迎新的必做功课。尘与陈同音，除尘即是“去陈”，把那些藏身于屋梁、角落的尘垢蛛网清扫干净，也把往昔的“穷运霉气”赶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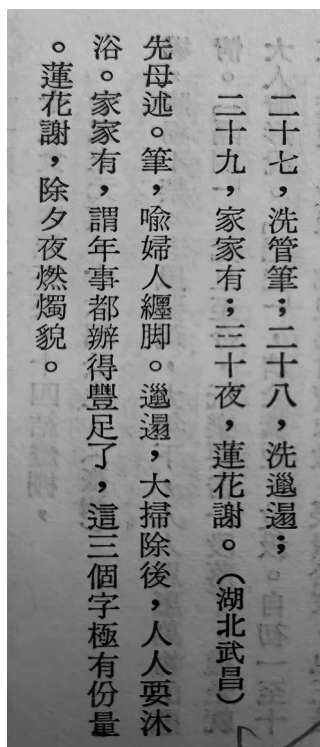
打块尘还有借代义，一个不大听话的小伢，听到大人吼“你再瞎闹，小心老子打了块尘好过年”时，就会明白关键是“打”字，弄不好，自己马上就要挨打了。

二十八，洗邋遢

朱介凡《中国儿歌》（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页所载武昌童谣简单一些：二十七，洗管笔；二十八，洗邋遢；二十九，家家有；三十夜，莲花谢。

“二十八，洗邋遢”。邋遢，肮脏，不整洁，也就是武汉话“垃圾”。洗邋遢，洗去身上圪渍，

此处特指沐浴洗澡。武汉人卫生习惯好，夏天必洗澡更衣，其他季节睡前也要洗脸洗脚，由此诞生出一句俗话说“洗了睡”，不洗是睡不着的。严冬时节，天寒地冻洗澡难，但过年之前，无论家境如何，剃个头洗个澡，那是必须的。年前的剃头，唤作“剃年头”；年前的



朱介凡《中国儿歌》所载相关童谣

洗澡，唤作“洗年澡”。年澡要洗彻底，时间会长一些，形容做事慢慢吞吞，武汉人会说“像洗年澡样的，伧（jǐn，长时间）在那里摸”。

“三十夜，莲花谢”。“莲花谢”比喻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到来了。武汉话“莲”与“年”同音，把“年结束”说成是“莲花谢”，虽系民间口传，却非常雅致，有文化内涵。

花鸡公，你莫叫，明日把你送上灶

“听他的话，你会过错了年”，年也会过错过？一般来说，大年是统一的，不会过错过，小年就不太一致了，向有“官三民四王八五”之说法。或者说，北方小年二十三，南方小年二十四。武汉夹在南北之间，亦南亦北，有点不同款。旧时有个趣说，武昌的衙门多，当官当差的多，过年要封官印，早一天过小年，早一天放假，早一天快活，因此武昌流行过二十三。汉阳、汉口这边商贾多，劳工多，过的是腊月二十四，晚一天过小年，多赚一天钱。至于那些唱戏的，此时要唱封箱戏，把他人伺候完了，自己只能在最晚的时间过小年。

过小年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是祭灶，拙作《武汉民间童谣辑注》有首童谣，系笔者儿时习唱：月月红，唱鸡笼，鸡笼窠里（里面）个花鸡公，花鸡公，你莫叫，明日把你送上灶。

过去家家户户都供有“灶爷、灶妈”，灶爷正宗封号为“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是天上玉帝派来监视人间和保护人间的特派大使，是民间最富代表性、最有人情味的流行神。据说灶神是地仙，不能驾云飞升，他的坐骑是只大公鸡，因此祭灶要用大公鸡。

关于“灶君，灶妈”的来历，从古至今，各省各地，诸说不一，大约有四十余种，楚剧连台本戏《郭丁香》是其一。男主张万良，虐待、抛弃贤妻郭丁香遭到报应，被大火烧瞎双眼，家产殆尽，只得乞讨保命。后遇郭丁香，羞愧难当，钻入炉灶而亡，却意外地被封成灶王，前妻郭丁香则成了灶妈，此说在河南、湖北一带流行。过去，鼓书艺人唱此事，统称为“唱灶”；有关戏剧，唤作“灶妈（丁香）戏”。

传说灶妈很勤俭，和普通人家一样居家过日子，自己还养鸡养鸭。蟑螂就是灶妈养的鸭子，武汉人俗呼“灶妈子”；鸡子则是一种擅长鸣叫的土蚰蚰，人称为“灶鸡子”。蟑螂和土蚰蚰是灶台上的合法居民，这是灶妈特许的。记得小时候，先祖母睡觉之前，有时会在灶台上放一些烂菜叶子，用来喂养灶妈的鸡子鸭子。

年来了，是冤家

过年，对于孩童是狂欢，对于大人是劳累，对于穷困的当家人，则是深深的无奈和纠结。这首载于朱天民《各省童谣集（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77页的《年来了》是一印证：年来了，是冤家，儿要帽，女要花，媳妇要勒子走人家；婆婆要糯米做糍粑；爹爹要肉敬菩萨；一屋大小都吃他。

在欠债之人眼里，过年更是过关。下面这首，讲述了一位老赖是如何赖年账的：年二七，“莫着急”；年二八，“我想法”；年二九，“有有有”；年三十，不见面；初一



楚剧《郭丁香》剧照

碰到“拱拱手”。选自《武汉市志·社会志·民俗》，朱建颂《武汉民间歌谣》亦有刊载，原题《拖欠》。

旧有“比期”之说，意思是古代官府催缴租税的限期，“端午、中秋、腊月”是约定俗成的三大比期，也就是追债的时限，其中“腊比”最为重要。自腊月起，债权人便开始上门催索，直至除夕。这位老赖练就了一张“顽(pǐ)脸”，到了年三十也不见人影，直至初一清早才回家。年债年还，这是老规矩，面对老赖的“拱拱手”，债权人只得等待下一比期了。

彭翔华，湖北省非遗项目“武汉童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学高级教师，曾任葛洲坝三中校长、明珠学校党总支书记等职

抗战英雄谢晋元在南洋大楼举行婚礼

◇ 田联申

《八佰暮年》一文讲述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战英雄谢晋元团长的夫人凌维诚，在丈夫牺牲后与孤军营老兵共度患难的故事，读来令人潸然泪下。守卫四行仓库的士兵，很多是湖北通城、蒲圻籍，大家都知道。但他们的长官谢晋元在汉口举行婚礼，也与湖北有缘，坊间却鲜有人知。

据有关史料说：“谢晋元 1905 年出生在广东蕉岭县农村，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遇到凌维诚的时候，他已是一名营长。1907 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商人家庭的凌维诚，可谓是大家闺秀，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和东南体育专科学校，钢琴、小提琴、唱歌样样拿手。谢晋元与凌维诚的相识，缘于 1927 年一场朋友的婚礼。当时，他俩分别是伴郎和伴娘，一见倾心，然后陷入热恋。第二年，谢晋元在战场负伤，在汉口治疗休养了快一年，凌维诚得知情郎负伤后，多次奔赴汉口照顾，陪伴。伤愈后，面对谢晋元的求婚，凌维诚不顾父母的反对，答应了下来。两人于 1929 年 9 月，在汉口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凌维诚在汉口生下大女儿谢雪芬。”



谢晋元、凌维诚在大华饭店举行婚礼

你知道大华饭店在哪里吗？不说不知道，说出来大家都很熟悉，在中山大道民众乐园旁的南洋大楼。南洋大楼的三楼为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一楼和二楼分别为大华饭店的接待厅和客房。

汉口有许多历史悠久的饭店，如璇宫饭店、德明饭店（今江汉饭店）、胜利饭店、汉口饭店等，现在都没营业了。大华饭店的历史同样悠久，且营业的时间最长，前几年还在开张迎宾。至今，二楼的客房仍保留着，只是关门谢客。大楼的侧边还有大华饭店的招牌，后面还有饭店的停车场。

田联申，武汉交通科学研究所退休干部

武昌彭刘杨路上的“武汉行营”

◇ 韩泽宽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简称武汉行营），1936年12月13日设立于汉口华商街（今江汉二路），1937年4月迁至武昌平阅路（今彭刘杨路）。

武汉行营存续期间，在国共合作框架下，与南方红军游击队开展和平谈判，统筹军事整备、民众动员与地方治安，并制定武汉防卫作战纲领，成为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党政军资源的重要枢纽。武汉沦陷后，武汉行营被日军占领。如今，行营原址建筑早已不存，行营具体范围也尚未有专门的研究考证。但结合多源史料与图像资料，可以为其自然沿革和职能演变，补充出较为完整的历史线索。



武汉沦陷时期平阅路上的武汉行营

武汉行营的地址变迁

出于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围剿”革命根据地等目的，国民政府多次在武汉设置行营，先后有1929-1931年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1935年的武昌行营（张学良任行营主任，营址设在武昌望山门旧湖广总督署处）、1936年12月至1938年6月的武汉行营、1946年3月的武汉行营（后改称行辕）。而1936年12月至1938年6月的武汉行营，由于更换过办公处所，其地址曾一度为史志所误载。《武汉市志·军事志》记载武汉行营设于汉口“华商街绥靖主任公署原址”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自1937年4月15日起，行营迁至武昌平阅路办公，直至1938年6月底结束。这一点，在邓正兵发表于《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的《〈武汉市志·军事志〉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驻地补正》一文中，已有较详细考证。

实际上，在最初的计划中，武汉行营的选址本就准备落在武昌。1936年12月1日，为便于进攻陕北红军和对日备战，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鄂特派绥靖主任公署撤销，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何成濬任行营主任，陈诚任副主任。4日，《神州日报》报道称“行营地点，闻将设武昌县政人员训练所”。9日，《时事新报》（上海）亦作同样说法，且称行营“月底将设立”。12日，不料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国民党各派势力人心浮动。此时正处于绥署已经撤销，行营尚未组织的尴尬局面，为稳定湖北省的局势，何成濬只能将尚未准备好办公地点的武汉行营仓促上马，便于发号施令。13日，武汉行营正式设立，

仍在汉口华商街汇通路上的原绥署办公。

4个多月后，1937年4月15日，武昌平阅路县政人员训练所已修缮完好，而绥署旧址“深感狭窄”，于是行营参谋、秘书、总务等处迁平阅路办公，军法处驻两湖书院，军医、交通、运输各处仍驻乙栈。这在当时包括《中央日报》《申报》在内的多家报纸均有报道，可见迁址一事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平阅路的县政人员训练所又在什么位置呢？翻看1930年代多张武昌城区地图，发现图中对“武汉行营”并无标注。在1937年及以前的地图上，也没法找到所谓“县政人员训练所”。县政人员训练所是国民党对地方区县干部进行集中教育的训练班，从性质上看是一个临时机构，地图上不予标注也属正常。而训练所确实在武汉设立过。1936年1月10日《民报》报道，主政湖北的杨永泰“为整理民政起见，决创办县政人员训练所，计全省应入所受训人员、县长区长等，约千余人，已训令主管厅处负责积极筹备。”此处没提到训练所的具体驻地，但另一则报道为我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线索。12月12日《申报》刊发11日汉口专电《武汉行营决设武昌》：“行营决设武昌，择定平阅路旧省府为营址，原有县训所统训班均迁出，其附近之特教班及江西会馆亦拨借为营址。”这为我们解答了问题：县政训练所就在平阅路旧省政府驻地内，紧挨江西会馆。而武汉行营的营址范围，包括旧省政府和武昌江西会馆整片区域。

然而，笔者查阅多张1930年代武昌城区地图，发现平阅路上并无所谓“旧省政府”，在江西会馆两侧，分别是同仁医院和湖北省公安厅。但平阅路上有过旧省政府，却有文献支撑——根据《武汉市志·政



1930年《新武昌市实测详图》局部，图中方框内为后来的武汉行营所处位置

权政协志》记载：“1927年5-8月，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改组为湖北省政府，采用常委制并成立各厅，‘七一五’事变后解体。其后，省政府驻武昌彭刘杨路。”在孙继善的《一二·九运动亲历记》中，记录武汉学生游行场面时提到：“这时聚集在九中的女同学，走在最前列，沿途高唱革命歌曲，不一会来到平阅路省政府门口，把它围的水泄不通。当时，湖北省主席是新任的杨永泰……”。这与方志上的说法相印证。可见，平阅路（彭刘杨路）上确实有过湖北省政府驻地。

其实，地图中江西会馆旁的“公安局”，就是旧省政府所在地。历史上，湖北省政府地址经过多次迁移。1932年前，湖北省政府在司门口与汉阳门街（今民主路西段）的交会处。1932年5月，主政湖北的夏斗寅力主将省政府迁移到省公安厅。5月6日，上海时政小报《福尔摩斯》发文《湖北省政

府迁移之内幕》谈及此事：“夏斗寅自主湖北省政以来，即亟亟于省政之迁移，省府原设司门口，轮奂殊美，今择定百寿巷（扩宽改造前的平阅路西段）公安局原址，涓于五月九日下午一时迁移。”该报称，迁移的原因是夏斗寅迷信，觉得司门口省政府的风水不好，才招致1931年夏武汉大水，为使湖北“大吉大利”，不惜迁到地盘更狭小的旧公安局里面办公。这就是平阅路上省府旧址的由来。此后杨永泰任湖北省主席期间，省政府实行合署办公，又搬到望山门

的旧湖广总督署（武昌造船厂原址），平阅路旧址就成为后来武汉行营的一部分。

抗战中的武汉行营

武汉行营下设参谋、秘书、总务、军法、交通、运输、经理、军医、政训等9处，其职责是主管湖北、湖南两省军事，修建国防工事，指挥与整理辖区内驻军，组织训练民众等。不过，在具体筹备对日作战时，武汉行营的职能远远超出了军事层面，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地方党务、军事、民政的监督指导机构。在武汉行营存续的一年多里，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贯彻国共合作，与南方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事宜。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通过一系列接触和谈判，对合作抗日问题逐步达成一致。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与此同时，坚持南方闽、粤、浙、赣、湘、鄂、豫、皖八省十五个地区，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军队伍，也纷纷下山谈判，准备集中改编为新编第四军。此后，武汉行营一面组织对日备战，一面对湖北及周边的红军游击队就和平谈判开始接洽。

1937年7月，鄂东南红军游击队主动表示愿意“与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共为实现中山先生之遗训而努力，联合起来扫荡敌氛，收复失地，彻底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武汉行营派出代表，偕同通城县长与中共湘鄂赣西北特委书记江渭清在通城县城谈判，达成红军游击队可从武汉行营和省府取得部分给养、可在通城设立办事处、国民党地方政府释放政治犯等于我党有利的协议条款。

1937年六七月间，中共湘鄂赣边区省委派出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黄耀南等人，先后在湖南平江的献钟、嘉义两地，与武汉行营的代表进行谈判。8月，又派黄耀南、刘玉堂赴武汉，参加了以中央代表董必武为首的代表团与武汉行营的谈判，达成了湘鄂赣边区所属游击队在平江县嘉义镇附近集结，暂改编为抗日游击支队，武汉行营供给军需物资的协定。9月至10月，何成濬又与董必武就湘鄂赣红军改编具体细节进行多次谈判。武汉行营在改编红军的过程中，展示出一定的合作态度，因此10月6日董必武向毛泽东、洛甫报告湘鄂赣、鄂豫皖部队改编事宜时，建议“鄂豫皖、湘鄂赣、湘赣以及项英、陈毅诸部都可改与武汉行营接头，事权统一办理”。

二是整理军事，动员民众。

武汉行营制定了《武汉行营对于武汉附

近非常时期防卫纲领》，为开战后快速歼灭盘踞在租界内的日军和长江水面上的日舰队制定了详细计划。在征兵抗日宣传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1937年6月28日，举办兵役扩大宣传周及兵役宣传大会，各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及各区保甲长15000多人参加。1938年1月31日，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声讨日寇在中国所犯的种种屠杀淫掠罪恶，号召民众“健全本身”“万众一气”。

但是，在管理抗日民众团体方面，武汉行营严格限制非官方的民众组织发展，力图把民众运动拉入官方所规定好的轨道上来。行营密令将民众团体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对于依照国民党中央及省的法令组织非常时期各种工作团、工作队，应“在县动员委员会领导之下加紧工作”。地方民众团体及其他热心救国人士努力抗敌后援工作者，与法令不相抵触的，“一律准许活动并指导奖进之”。而未经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政府准许备案或登记的团体，一律不准有何活动。对于已经登记的团体，如有“违反三民主义、诋毁政府及不利于抗战之言论行动”，一律严加取缔。

三是加强地方治安，整顿行政。

武汉行营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刺探情报的汉奸敌特，缉拿盗匪，稳定社会秩序。武汉行营逮捕和枪决汉奸敌特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仅在1937年6月至9月，本地媒体就报道过三起对通敌卖国的汉奸执行死刑的新闻。根据《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办法》《经济资敌治罪条例》，严格排查商店进口销售敌货的行为，一经查实严厉处罚。在行政方面，严格整顿公务员的生活和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

除此之外，武汉行营还负责对武汉新闻



1938年10月26日，日军占领武汉行营

媒体采取战时管制，并统筹交通运输。

随着抗战正面战场日军的步步进逼，国民党主要政府机关和中央党部于1937年11月迁驻武汉办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设于武昌，武汉行营作为军事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在职能上形同骈枝。于是，何成濬在1938年6月14日呈文请予撤销武汉行营。24日，武汉行营停止办公，月底裁撤。

武汉行营旧址的命运

1938年10月26日，突入武昌的日军平田部队占领武汉行营，癫狂的日军在武汉行营大门前欢呼庆祝，留下了那张广为流传的扎眼照片。《朝日新闻》详细报道了日军进入武汉行营内部后看到的景象：“记者进入了在武昌的武汉行营，造访了被认为是蒋介石军事指挥室的房屋，还看到了蒋介石的

居室。这里放着数百盆花卉，还有藤条编的架子以及阳台。阳台下面是修的很隐蔽的防空洞，屋顶上好像有泥土掩盖着的高射炮阵地似的。行营的三分之一，被我空军炸得体无完肤，防空洞也在敌人逃跑时放了火，从窗户往上都有火烧的痕迹。”

此后，武汉行营旧址的命运如何？一般对此仅有一句“已不存”。武汉光复后，1946年新设的武汉行营地址仍在汉口华商街。那么，平阅路上的原武汉行营又作什么用途？何时被拆？这一问题由于缺乏

资料，前人尚未作过详述。

武汉沦陷前夕，日机对三镇的轰炸曾对城区造成较大破坏。1938年8月18日，《大公报》报道了日军空袭武昌后的惨状：“金龙巷、平阅路、陶家巷一带都成粉碎……艺术专科学校、省立第九小学、省立高中都已破败不堪，尤其是市中心的邮政局，竟被炸的粉碎。”不过，武汉行营在这次轰炸中受到的毁坏，显然还不太大。除了平田部队



武汉行营区域航拍图，行营院落门楼位于右下角



《鄂报》上的伪湖北省府大门图片和沦陷时期的伪省府影像

在行营大门前的那张合影外，沦陷时期还曾留下一张武汉行营周边的航拍图，从图中看行营周边建筑保存尚且完好，门前有日军进出，说明此处已经被征作新的用途。

1939年11月6日，日军扶持的伪湖北省政府粉墨登场，何佩瑢在武昌原金城银行支行旧址宣布就任伪省长。1940年3月30日，汪伪南京政府成立，日本政府和“梅机关”为了支持汪精卫，将伪湖北省政府纳入汪伪中央政府之下。笔者尚未找到描述伪省府具体办公地址的文献，但通过查阅图像史料发现，日军占领武汉行营旧址后，将其改建用作伪省府办公地。有一张沦陷时期拍摄的伪省府正门影像，对比原武汉行营大门照片，可以看出已将行营门头铲平，在高耸的行营大门墙体上嵌入一座中式门楼，挂“湖北省政府”牌匾，形制堪称不伦不类。再比对1940年日伪发行的《鄂报》上的伪省府大门图片，二者建筑外形完全一致，仅有角度不同。

汪伪政权声称要在武汉“协助复兴胜迹，唤起保存运动”，为此成立了一个“武汉胜迹保存运动委员会”，1941年10月12日举行“武昌胜迹巡览大会”。武汉文史专家徐明庭在《记汪伪武汉胜迹保存运动委员会》一文中记述，这一众汉奸“4时赴伪省府，参观古梳妆台”。这里的“古梳妆台”是明楚藩王府内妃子的梳妆台遗址。据清同治《江夏县志》记载，明楚王府遗址的范围是：“在高观山（蛇山中部）下，前临大朝街（今复兴路），左阅马厂（今阅马场），右长街（今解放路），宫广二里”。王府于明末被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摧毁，而留存下来的梳妆台遗址，就位于平阅路武汉行营之中。可见，这时汉奸到达的“省府”，即为沦陷前武汉行营的位置。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还治武昌。观察1946—1947年的武汉三镇地图，赫然可见原武汉行营的位置有了一个“省政府”，江西会馆则仍复如旧，紧邻



1947年《汉口武昌汉阳城市图》局部，“省政府”位于武汉行营原址

的明楚王府梳妆台遗址也被清晰标出。那么，抗战胜利后湖北省政府，是否重新设在1937-1938年时的武汉行营旧址呢？

1945年9月24日，《新湖北日报》发表《湖北省政府正式还治武昌》的消息：“王主席抵汉消息，业已迭志本报，顷悉王主席于十八日在汉参加受降典礼，十九日晨即偕李馆长书城、沈议长肇年、王厅长开化、钱厅长云阶及随行人员渡江同抵省垣，开始办公。并闻武昌省政府，原址尚属完整云。”

这则新闻中的“王主席”，是1944年7月后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王东原，从中可以判断省政府还治后的办公地点，就在尚属完整的“平阅路省府”即武汉行营原址内，且并不是临时性安排。《湖北建设志·城乡建设》记载：“本年（1945年）省建设厅随省政府迁到武昌彭刘杨路，省政府内东侧合署办公（今湖北省水产局水产货栈）。”

更多的文献史料表明，省政府至少到1947年仍驻此处。1947年5月22日，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血案，武汉大学爱国学生上街响应“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运动，高喊“反对内战”“打倒官僚资本”等口号，游行队伍先抵达汉阳门码头，因当局故意停航，学生遂“折返平阅路，向省府要求派船渡江”，并闯入省府与工作人员对峙。这说明此时省府仍在平阅路办公。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以李先念为主席的湖北省人民政府接收了平阅路旧省府，在此办公了一段时间。因此，武汉行营的主体建筑——平阅路旧省府和江西会馆，应是在后来的城区改造中拆除。

韩泽宽，武汉图书馆助理馆员